

美國外交官 的 觀察

美·布爾克著

姚周傑
紀堅博
徐和
馮和
譯

羣衆書店出版



578:5248
353
(994)

贈閱

美國外交人員的眞象

美·布·克爾著

譯

傅博編

國經

新紀周倫



群衆書店出版

1949·7·25

羣衆書店
九七



3 0477 1495 5

獻給我的母親

目 錄

前 言	(一)
第一章 我的諜報工作	(三)
第二章 國務院中的最高反蘇集團	(一一)
第三章 我到莫斯科	(三四)
第四章 美國大使館的諜報活動	(五四)
第五章 美國新聞處和美國宣傳	(六六)
第六章 美國大使館的投機商	(八五)
第七章 美國統治者爲什麼要揮動大棒	(九六)
第八章 我對蘇聯的印象	(一〇四)

美國外交人員的假面具戳穿了

——代序

以下這篇文章是連載於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七，二十八及三月一日真理報上的柯齊列夫所著一文的摘要，由塔斯社播發。新華社會予以轉播，在各報上發表過，茲特附刊於此，以代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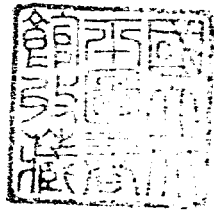
譯者

一年以前，美國駐蘇大使館新聞處副處長布克爾女士，她寫信給美駐蘇大使史密斯提出辭職，並聲明她願意留居蘇聯。在這一年當中，她寫了一本『美國外交人員的真面目』，揭露她從前在美國國內諜報機關以及後來到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工作期間所目睹的一切。

這本書以親身看見的事實揭露了新戰爭挑撥者的真面目。

美國間諜在各種偽裝下混入蘇聯

布克爾寫道：『根據各種觀察，我有資格確定地斷言：美國諜報機關的首領，利用了第二次大戰期間美蘇兩國的同盟關係，派遣職業間諜到蘇聯，進行反對這一同盟國家的間諜工作。這些間諜是以各式各樣的偽裝派往蘇聯的，他們充當大使館的顧問，等及三等秘書，參贊或小職員



，充當軍事使團的軍需及大使館的武官，或者充當美國報紙、雜誌與廣播公司的訪員，或者充當幫助裝置按租法運往蘇聯各種裝備的專家。」布克爾強調稱：「戰犯服務處（按係美國在戰爭所成立的諜報機關）從它開始活動的時候起，便特別重視發展反蘇的間諜活動。到大戰快結束的時候，戰犯服務處即集中注意於設法獲得關於蘇聯的外交政策、以及與蘇聯訂立友好條約的各民主國家的秘密情報……。」

美國反蘇小集團陰謀挑起反蘇戰爭

美國諜報機關的反蘇活動，和美國外交機關處理美蘇關係的那一批官員的活動，是完全一致的。布克爾稱：「美蘇關係是由首要外交官員的小集團壟斷着，他們『屬於美國外交機關極端反蘇的一翼，而且力圖挑起反蘇戰爭。』這一小集團把一切美蘇關係緊緊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並制訂了國務院所運行的對蘇政策。這一批集團是一切反蘇陰謀和不斷對蘇進行卑鄙的污蔑與誹謗的鼓動者，使這種污蔑與誹謗不斷地在美國出現。這個來自國務院的反蘇專家小集團的幕後牽線人，是華爾街的壟斷資本家。」

布克爾列舉了這一反蘇小集團的成員的名字描述他們每一個人的生平，並列舉了許多事實，說明他們企圖使美蘇關係惡化。該集團的要員是勞伊，亨德遜。在美蘇外交關係建立之後，他便使他自己被任命為駐蘇大使。美駐蘇大使館的一切職員，實際上都是他物色的。他『利用一切可能進行反蘇活動』。在美國外交機關反蘇集團中充當美駐蘇大使館參事的喬治。凱南（按：凱南

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主席），是亨德遜最心腹的助手。他於一九四四年第三次來到莫斯科。這位『參事』在獲得美駐蘇大使哈里曼的有力支持之後，便日以繼夜地向美國國務院拍電，故意地誹謗與歪曲蘇聯的外交政策。

這就是美國外交機關那個反動集團的特性，該集團壟斷了蘇美之間的事務，他們處理這些事務的目的，是要有利於他們的主子——壟斷資本家，有利於他們自己，而損害美國人民的利益、損害全世界和平的事業。

美國駐蘇大使館製造反蘇誹謗

布克爾道：『在大使館的時候，我了解到我正繼續着從前在國內所服務的那同一謠報機關中的工作。所不同的，僅是我以前是在那個從國外接受綜合情報或分類情報的機關中工作，而現在，我是身臨前線，是來到了獲取蘇聯情報的組織中。』

布克爾指出：現在美駐蘇大使史密斯將軍是職業謠報官。她說：『國務院需要任命經驗豐富的特務充當大使，以便在反蘇間諜活動中，給『職業外交官』必要的指示與適當的領導。』該書舉出事實，說明美駐蘇大使館各種活動中最醜惡的方面之一，便是製造反蘇誹謗並以之供給美國反動派。布克爾宣稱：我本人知道大使館好幾次收到國務卿或副國務卿拍來的密碼電報，調令搜集歪曲的情報，供給美國報紙或廣播電台，以便進行廣泛的反蘇宣傳。布克爾在說到美駐蘇大使館各個諜員的活動時寫道：在大使館的首腦當中，最富於色彩的人物之一，是大使館的參事杜爾

布勞。由於他的賣力，在大使館職員與蘇聯生活之間，已經樹立起了真正的「鐵幕」。布克爾指出：杜爾布勞是拍往國務院的最重要電報與報告的撰稿人，他僅只「拍發同他的政策相符合的污穢性的情報」，不僅如此，布克爾說：任何反蘇的流言、或任何可以用反蘇的精神加以歪曲的事實，都使他像小孩子獲得一個新的玩具一樣高興。

布克爾寫道：美國大使館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是大使館的秘書萊恩哈特。他同時也是美國大使館的新聞處處長，他將蘇聯報紙所發表的新聞蒐集起來，轉發給華盛頓。萊恩哈特經常集中精力搜集一些有關蘇聯的政策和政治生活的事件，加以相當的解釋，加以極度的歪曲，來誹謗蘇聯。

美駐蘇大使館的特務活動

布克爾寫道：就連大使館普通的職員，都被迫從事諜報活動。當他們爲了這個或那個目的在蘇聯旅行時，必須把他們在途中耳聞目見的每一件事務，和蘇聯人民的每一次來往與交談等等，作詳細的報告。布克爾詳細描述大使館參贊，前美國海軍少校、特務路克奉大使館一些首腦人員的命令旅行海參崴的情形。據說他是爲了外交公務，但事實上，却是搜集有利於美國諜報機關的情報。

布克爾指出：最近，大使館三等秘書佛里爾斯曾作同樣性質的旅行，訪問烏拉爾、高加索、中亞細亞。

布克爾寫道：美國大使館特務活動的途徑之一，便是利用那些爲這種或那種私人目的來到該使館的人們。該書指出：美國大使館的諜報工作，是嚴格地按照經過深思熟慮所想到的特務系統的路線去進行的。布克爾強調稱：史密斯發現在他的前任哈里曼（他僅是臨時的而不是職業的特務）任期內，美國大使館的許多諜報活動都是「幼稚」、「淡薄」的，必須加以澈底改革。該書作者指出：在史密斯領導之下所進行的這些改革，其特點特別可以從下面的事實表示出來：史密斯實際上強迫每一個大使館的職員，直到最低的小職員，都從事間諜活動。

布克爾在她的著作中列舉事實，說明美國大使館利用美國駐蘇記者，進行間諜活動的情形。布克爾特別描述因從事間諜活動被蘇聯驅逐出境的美國記者羅伯特·馬基多夫（按他於一九四八年四月被逐出蘇聯）。

布克爾指出的事實，都是無可爭辯的。她寫出了美國特務的姓名，揭露了他們的工作方法，揭露了美國報紙爲了進行無限制的反蘇宣傳而取得一些誹謗資料的來源，並說明了美國駐蘇大使館領導人員的真相，他們以外交活動的偽裝，來掩蓋他們的特務工作。

「美國呼聲」與「美國人」

布克爾在她的這本書中，又論述了美國新聞與宣傳機關的情形，揭露了美國反蘇宣傳的方法，說明了這個宣傳奉行着怎樣的目的，以及美國的反蘇宣傳文字是由誰執筆的。美國的對蘇宣傳有兩條途徑。第一，以「美國呼聲」的名義，從美國用俄語播送節目。第二，在蘇聯出版俄文雜

誌『美國人』。布克爾寫道：『美國呼聲』不僅聘請白黨匪徒當廣播員，並且積極地利用他們充當俄羅斯問題專家和無線電廣播節目的顧問。布克爾說：不僅『美國呼聲』利用白黨匪徒，而且國務院首腦們也利用白黨匪徒工作。布克爾描述一個名叫巴尼斯的人，以證明國務院利用白黨匪徒的事實。她本人很久以前就認識這個巴尼斯。巴尼斯實際上是白黨匪徒在美國駐蘇大使館的代表。巴尼斯的母親與前伯爵夫人托爾斯塔雅一同住在紐約附近的一個農莊（按：這個農莊是逃亡美國的白黨匪徒的一個反蘇據點）。巴尼斯自己也是托爾斯塔雅的密友，他們兩人在反蘇挑撥活動上合作。布克爾指出：國務院的反蘇統治集團對『美國呼聲』的廣播寄以鉅大希望。這一集團幻想『美國呼聲』會變成蘇聯千千萬萬家庭的催眠曲。布克爾寫道：然而，『美國呼聲』的主持人，忘記了蘇聯的無線電廣播聽眾與美國的聽眾完全不同。『美國呼聲』在蘇聯絲毫不受歡迎，而且實際上沒有一個人收聽它。布克爾說到『美國人』雜誌時指出：它欺騙不了蘇聯讀者，而且也不合他們的口味，蘇聯人不願被人無恥地愚弄。

美駐蘇大使史密斯帶頭進行投機買賣

布克爾不僅揭露了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人員從事諜報與新聞宣傳活動的特色，並且又揭露了他們的詭譎的黑市活動。她列舉了無數的事實，證明美國大使館的每一個職員，實際上都從事或大或小的投機活動，或在外交官特權的掩護下，非法運入外幣並免稅攜帶威士忌酒、香烟等商品到蘇聯出售，獲取大利。布克爾寫道：史密斯大使自己也是高興參加這種卑污的投機的。美國大

使館供給處主任班德（他執行大使的指令）對作者說過：史密斯交給他到市場出賣的成套衣服，自來水筆與香煙，在市場上沒有銷路，賣不出去，但是『主子』逼着他要錢。

布克爾爲什麼要留居蘇聯

該書的最後一章，專述作者對蘇聯的印象。該書作者寫道：我看到蘇聯普通公民對美國的了解，比美國人對蘇聯的了解爲多。蘇聯普通公民對美國生活問題的了解，還不像美國人對自己國內生活的了解那樣不恰當。我已經確實認識到：蘇聯報紙並沒有從事任何要激起仇恨美國人民的宣傳。而在同時，美國報紙與無線電廣播的全部力量，都是直接反對蘇聯人民的。布克爾說：蘇聯公民高度尊重與信任他們的政府、布爾什維克黨和他們的領袖們。蘇聯公民是熱誠愛國的，蘇聯人民認爲他們的國家是正義的，而蘇聯也的確是正義的。布克爾這種印象，是由細密地研究蘇聯的現實所得到的。她曾旅行過蘇聯許多城市和鄉村，特別是旅行了烏克蘭。

布克爾寫道：我雖然是百分之百的美國人，一貫愛我的國家，並會無我地爲它服務；然而，我却決定永遠留在蘇聯。對於這個國家，我過去只有頗爲模糊的認識，但是，在那個時候，僅僅住了兩年，我已經很瞭解它，並且很愛它了。我所以要作這個決定，是因爲我已經確信：美國當前的統治集團，正在把美國、並且還把全世界同它一起導向可怕的大災難。

美國的宣傳機關，無疑地將企圖使人不相信布克爾所著的書。已經有人在這樣作了。然而却沒有任何人能反駁這本書裏面所寫的事實，而且，無論如何都不能削弱這些事實的鐵的邏輯。

前 言

過去的一年帶來了我一生中的巨大轉變。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我愛慕我的祖國並誠摯而無我地爲它服務，然而在過去這一年中我決定了永久住在蘇聯，這個國家我已經十分了解它並愛慕它，雖然我在這裏只住了兩年。如果有人以爲我是輕易下此決定的，那就錯了。我長時間地反覆考慮過促使我走向這一步驟的一切因素，同樣也考慮了反對這一步驟的各種因素。但我採取了前面一個，因爲前者有更深刻的理由。

不懷好意的人們從我的私生活中去尋找這些動機；然而，再沒有比這個更不符合於真實情況的了。事實是，這些動機純粹是客觀的。我之所以下此決心是因爲我確信美國的統治集團正引導着美國及整個世界走向可怕的禍患。

我並不是一夜之間就有了這樣的醒悟的，也不是因爲聽了和讀了傳佈和平事業的組織和個人所作的演講和所發的小冊子的結果。這是我在華盛頓國務院及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將近三年的個人接觸和日常工作的結果。在華盛頓和在莫斯科一樣，我目賭負責美國外交政策的美國外交家們如何逐步地在他們的勞力之內盡一切努力將世界引向災禍。他們的政策在目前和過去是一直反對蘇聯的，而蘇聯呢，據我所了解的，過去和現在一直在努力中止他們破壞世界和平、破壞全體人民爭取更幸福和更美好的生活的一切努力。

這些外交家感覺到正是蘇聯在阻止美國億萬富翁統治全世界。因此，他們底急迫的目的便是
要破壞蘇聯的信譽，將侵略意圖餒之於蘇聯，從而爲他們自己對蘇戰爭的準備做辯護。因爲，當
我在國務院和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工作期間，我開始深信這兩個機關的高級首腦都向着這個目的努
力。

顯然，我是在進退兩難之中：一聲不響而盲目地完成國務院及莫斯科美國大使館的戰爭販
子所給的任務，因而背負了一部分對全世界人民的巨大責任，或者是，大聲喊出反對他們的可怖
活動，在大使館中做這樣的抗議不管是曠野中的呼聲。所以，必須採取更有效的步驟，也就是說
，使我有機會有勁地去參與反對戰爭販子的鬥爭的步驟。要這樣做必須棄絕一切私人的和感情上
的考慮，這就是我現在所做的。

我辭退了大使館的職業，決意留在蘇聯，將盡我的能力參與和平與繁榮世界的工作：

這本書是我和一些人們廣爲交往的結果，美國人民會期望這些人們與各國，其中包括在反法
西斯主義的致命危險的戰鬥中爲人類盡了不可估價的貢獻的蘇聯，保持並發展善鄰關係。但，我
在國務院和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所目標的活動却與美國人民的這些期望大相逕庭。我看到達摩克利
茲（指暴君——譯者註）的劍懸在人類的頭上，劍鋒正漸漸下指，再一次威脅千百萬人民的生命。

因此我不能緘默。

第一章 我的諜報工作

我生於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附近的一個大家庭裡。我的父母和許多匹茲堡地方住的人們一樣，是爲了要在人們所告訴他們的『財富，自由與絕好機會的國度』中尋求更美好的生活而來到美國的歐洲移民。

我底父母像其他來到美國的移民一樣，不久就知道了事實上他們是爲了供人剝削而被『輸入』的。他們是一種通稱『廉價勞動』的商品單位而被購買他們的勞動的僱主們當作和其他工業原料如美國煤鐵工業中心煉鋼用的煤和鐵砂一樣的東西。

許多移民在可怕的剝削和無法無天的虐待下死去，有些，較幸運的人們返回了歐洲。還有許多則終身在那裏當勞工，大部份是死無葬身之地。我的父母費了很大力氣活下去，幸虧家裏勞動多，得以在匹茲堡附近的一個農莊上發展成中常之家。

我在高中畢業後，不管一切困難，決意要受更高的教育。政府是沒有給學生獎學金的制度的。因此我進入匹茲堡大學時不得不半工半讀來繳付我的生活費和學費。我像大多數的美國大學生一樣在我的整個求學時期內作工生活。在過度工作和憂慮能否完成學業，或畢業後能否找到職位的極度艱難與不安定的四年後，我離開學校去找職業。

最初我在好幾家公司做些短期工作，戰爭期間爲美國諜報機關工作，後來我在國務院得到一個位置，到了戰爭結束時我就被派到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去工作。

這是我的簡單的歷史，它除了說明我祇是千百萬個從歐洲來到美國的移民的子女之一，一萬萬四千萬個有着各方面同樣背景和經歷的美國人之一之外是毫不重要的。

在美國，在家庭和學校，在大學和紐約與華盛頓的職業方面我所接觸的人們中，找不到幾個在過去和現在的生活不是充滿了艱難困苦的人。

歐洲人對美國人的生活的普通概念，總以為在美國，任何人都生活在經濟穩固和對前途充滿了信心的狀況中，而美國的年青人是在無憂無慮和幸福中長大的，這是完全不正確的。

祇有當我在華盛頓國務院和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工作時我才接觸到那些年青人，除了很少例外，他們都是上層階級的兒女，並且是在養尊處優的富有環境中長大的，他們與真正美國人民生活之間的距離有如另一星球上的人物。他們是屬於我們這些構成國家主體的人們以外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的。

而我呢，當然，過去所過的是一種小康生活，我在各方面比之我同時代的多數年青的美國人要幸運得多。不像我的許多朋友和相識的人，他們年齡很小就離開學校去到匹茲堡區煤礦，鋼鐵廠，商店和工廠去工作，而現在還是大部都在礦山，工廠和商店，我總算受到高級的教育而謀得『體面』的工作。

離開大學之後，我有一個時期在私營企業中工作，但這種工作並不使我滿意。我感到一種強大的欲望，即在反對法西斯德國的戰爭中做一點工作，貢獻我的才能。當時美國空運指揮部謀報處有一個位置，我接受了。

我在該機關的北大西洋司工作了一個時期，不久之後被調到美國的基本諜報組織，戰畧服務處的外國民族組。

我最初的職務是仔細研究在美國出版的各外國報紙和定期刊物，尤其是用斯拉夫語言出版的。我是要寫關於在美國的各種斯拉夫團體，尤其是進步的團體的活動的總評和報告。他們希望我在這些報告中建議如何利用這些團體來完成戰畧服務處的諜報任務。

我會以為我在美國諜報機關中工作會真正有益于反對全人類的敵人希特勒主義的鬥爭的。我是激頭激尾的憎惡法西斯主義的，我以為作諜報工作是與法西斯瘟疫鬥爭最好的方法，後來，我發現我自己這一種唯心的想法，至少是太天真了。如所週知，美國諜報機關在戰時並不出力與法西斯主義作鬥爭，而在戰後他們又奉行了與德、意和西班牙過去及現在的法西斯諜報機關及反間諜機關充分合作的政策。

在戰畧服務處工作期間我熟悉了這個諜報機關的歷史，作用，工作方法和方式的一些有趣的詳情，這個諜報機關美國人給它一個綽號叫「袖裡藏刀」。

戰畧服務處處長是威廉，唐諾萬將軍，一八八三年生于紐約巴弗洛城，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法律學院。第一次大戰時他在法國境內美國遠征軍騎兵團裏。唐諾萬為天主教徒，共和黨人。一九三二年落選的紐約州長候選人。

戰畧服務處的工作從一開始，唐諾萬將軍就設法獲得美國政府的信任。他以極詭詐的手段使華爾街的反動勢力得以對這個組織施以影響。

他所以能如此，是因為羅斯福當時正忙于更重要的關於美國作戰努力的事情。因此唐諾萬私目物色他的諜報機關的高級人員。

唐諾萬邀請他的同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友來担任行政上的領導職位。他們是：G. H. 勃克斯登上校，他與唐諾萬在一九一九年一同爲法西斯組織——美國歐戰將士團——打下了基礎；阿瑟登，李却斯，一家大的進出口公司——夏威夷波羅蜜公司的總經理；J. W. 毛根；華爾街的喉舌——幸福雜誌的埃爾摩，羅伯；J. 立沃摩——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和一個華爾街的律師，及其他一些人。唐諾萬也聘用邱吉爾的表兄弟雷蒙，蓋司特在戰略服務處工作；百萬富翁，H. 瑞揚的兒子；反動的紐約太陽報的老闆皮爾，狄華特；美倫百萬家產的繼承者保爾美倫，及以前沙皇太子賽爾傑·奧勃林斯基將軍，此人在加入戰略服務處之前是個窮光蛋。

戰略服務處成立後不久，唐諾萬即派他的代表們到外國去收集各國的經濟情況和政策的情報，許多人是以前聞記者身份出國的。

法國戰敗之後，唐諾萬到法國去調查法國所以潰敗的原因。

回到美國之後，唐諾萬很自信地報告美國政府，法國的戰敗並不是如布立特大使和美國報紙所報告的因爲『第五縱隊』，也不是因法國共產黨的活動而是因軍事領導的薄弱和法國對現代戰爭的毫無準備所致。

此後唐諾萬又到巴爾幹和中東，他也往訪倫敦，開羅，雅典，貝爾格萊德，索非亞，安哥拉和耶路撒冷，他這一次旅行是爲了要給美國軍界收集些專門情報，同時也檢查美國諜報機關在這

些國家的工作。

在阿爾及爾時唐諾萬與魏剛將軍作了一次冗長的討論而對北非洲的情勢得到澈底的了解。事實是，美國在一九四〇年底開始預備在北非作戰，並且在那時候已經通過美國諜報機關與北非的法軍當局建立了關係。

一九四二年九月唐諾萬在倫敦與所謂的SOE英國經濟作戰部諜報服務處的首腦，討論在軸心國和軸心國佔領區散發秘密的宣傳材料的問題。決定在這些國家散發宣傳品，給親同盟國份子精神上的援助，但同時又不允許他們過早地在對英美兩國不利的時候起來反抗德國人。在這些談判中考慮被佔領國家的人民的利益是放在最後的。

按歐洲人民對法西斯主義的憎恨之機，戰界服務處與這些國家的地下抵抗團體建立關係，派遣他們的特務滲入到這些團體中去，打算在戰後利用他們為美國諜報機關服務。

當我從報上得悉美國諜報機關於幾個月前供給法西斯，西班牙反間諜機關一個名單——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法國從事抵抗德國運動的西班牙人的名單時，我極為震驚。使我頓領的是：這就是美國以德報怨對這些會援助他們的遊擊隊的報答。

在戰界服務處工作不久，我發覺這一組織的主要諜報活動不只是對付德國，而也是對付蘇聯的。

根據我的許多觀察，我可以斷言：美國諜報機關的首腦，利用第二次大戰期間美蘇兩國的同盟關係，派遣職業間諜到蘇聯進行反對這一同盟國家的間諜工作，這些間諜是以各式各樣的偽裝

派往蘇聯的，他們充當大使館的顧問，二等及三等秘書，參贊或小職員，充當軍事供應使團和軍事參贊辦公室的官員和職員。最後，但為數並不少，充當美國報紙，雜誌和廣播公司的記者，或者充當從事裝配租借裝備的專家。

美國諜報機關的反蘇活動方向由這一事實證明，即當美蘇聯盟與法西斯德國作戰期間，戰事服務處的蘇聯組是最大的組。組長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歷史教授在美國被稱為蘇聯問題大「專家」的羅賓遜。

蘇聯組由幾個專門部份組成，搜集關於蘇聯工業和軍工生產量，運輸，人力，國民收入，對外貿易，農業等等的情報。

戰事服務處從剛開始活動的時候起，便特別重視反蘇間諜活動。到大戰結束的時候。戰事服務處即以搜集有關蘇聯及其外交政策，以及與蘇聯友好的各民主國家的秘密情報當作最重要的工作。

我確知在倫敦的戰事服務處代表們，與英國，希臘和比利時的諜報人員及新招的代理人建立密切的聯繫，這些人不但供給他們關於敵人的，並且供給他們關於同盟國的，尤其是蘇聯的秘密情報。

例如，戰事服務處的重慶代表們就搜集有關蘇聯的情報。一九四二年戰事服務處派遣專人白俄匪徒L托爾斯泰，到西藏去調查鄰近蘇聯的邊沿地區和在這些地區組織反蘇間諜活動。從伊斯丹堡的戰事服務處人員中派遣特務到德國，同樣也派到蘇聯。

在某些場合，當有利于美軍指揮部時，戰畧服務處的人員在德佔區組織騷動；在另外，也是更經常的一些場合中，他們有意地阻滯抵抗運動的發展並指揮它走向對美國戰畧上有重要意義的方向。我確知戰畧服務處一直有意地把法國抵抗團體的反抗延遲到盟軍登陸的日子。在暹羅的美國人也是採取同樣的行動，雖然抵抗運動的領袖們已做了對日本佔領軍來一次總暴動的一切必要準備。

戰畧服務處從志願的美國新兵中組織成小規模的特別工作隊。在很多場合中，這些工作隊充作歐洲和北非洲被佔領國家抵抗運動的組織者並在那些地區建立反動的地下組織。他們搜集諜報材料並積極參加反對人民陣線遊擊隊的鬥爭，尤其反對法國的共產黨。他們全力支持戴高樂將軍底地下組織，戴高樂無疑地要貫徹美國人的一切命令的。

戰畧服務處不僅在德軍陣線後面搜集諜報，並且打擊歐洲佔領區的進步勢力。同樣的工作隊也在打擊日本的進步勢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從當時在美國讀書的暹羅學生中招選一批最可靠的新人員。他們被送到戰畧服務處的一個專門的諜報學校裏去。在那兒，暹羅學生學習無線電通信，破壞和遊擊戰術。這個工作隊秘密潛入暹羅，設法滲入抵抗運動的指揮機關並獲得對它的控制，這就使該工作隊幾乎能等完全利用這一運動去執行美國諜報機關的命令。

在戰時，繼美國政府與蔣介石之間締結特別協議之後，在中國成立了一個中美諜報機關，後來稱作中美合作組織，簡稱 SACO。SACO 的工作是由戰畧服務處指揮的。

美國諜報人員得到蔣介石政府的充分合作。一美國海軍部的文件稱：兩個諜報機關之間如此密切合作誠屬史無前例。

我可以保證這兩個諜報機關的合作直到現在還在繼續着。美國諜報機關在其反對蘇聯遠東部分的工作中繼續利用中國的諜報處。

我在大使館工作期間，得悉駐莫斯科的中國大使館的諜報人員是美國諜報人員在蘇聯的有力助手。

因此我們看到，原來似乎是爲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崇高戰爭而成立的諜報組織，在戰畧服務處的反動頭子唐諾萬將軍和他的華爾街盟友領導下是怎樣變成了訓練反蘇間諜和別種破壞工作的反動大本營。在戰畧服務處活動的那些國家中，總是得到那裏的反動份子所支助。這些反動份子對蘇聯進步和民主是同樣憎恨的。

在戰時，唐諾萬和其他美國諜報機關的首腦們把美國與蘇聯的同盟關係看作純粹是一種形式，必要的但不是真誠的。他們想利用蘇聯人民在這時期中所遭遇的艱難困苦。他們不耐煩地等待蘇聯力量的削弱，希望在戰後他們能够迫使這一大國屈膝。他們是大大的失望了。

但是，失敗並沒有使他們聰明起來，現時他們野心如故。他們顯然沒有從希特勒和法西斯德國所受的教訓中獲得教益。

第二章 國務院中的最高反蘇集團

在美國政府的圈子裏，尤其是在莫斯科的美國大使館中，盡人皆知，蘇美事務是由美國職業外交官員的小集團壟斷着。

從一九三三年在莫斯科設立美國大使館以來，這個集團，或者毋寧說是系，就獲得了在國務院中有決定性的發言權。自然，他們會不得不和幾個不是他們一夥的國務卿與駐蘇聯大使打交道。

然而，這些「蘇美關係的壟斷家們」是完全控制了國務院，和莫斯科美國大使館的人事機構，除了很少幾個時期，他們常常能夠強使他們的反蘇方針在幾乎是所有重要事件及全部次要事件中推行。

特別是今天，這個集團，牢固地被密切的友誼關係，更重要的是被共同利益關係結合在一起，盤踞着全部外交機關和國務院的重要地位。

這個「蘇美事務壟斷集團」的成員們也是由同樣的政治觀念把他們結合在一起。他們全都屬於美國外交機關中惡意的反蘇集團中極端反蘇的一翼。他們都相信必須挑起反蘇戰爭，這是上帝所預定的。

我知道很多這樣的人。有些是我的上司，有些是我從熟悉他們的人們那裏聽到的。當我談到他們的政治觀和他們的一般情況時，我知道我是在說什麼。

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時，我和所有其他大使館職員一樣，每天與這些「蘇美事務壟斷家們」打交道。所以我很熟悉他們。

對他們愈熟悉，我對他們的機關的活動愈厭惡。我對這集團的活動深感興趣，以致我有意地費很大勁去研究他們。我並不諱言我知道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假如我能把我所知道的，即使是其中的一部份，向全體大眾傳達，我想也許可以使全世界的普通人民更好的了解爲什麼美國對蘇聯的態度是如此的仇視。

美國國務院反蘇集團乃是近代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一個微小的但是佔決定地位的官僚集團和一個代表資本主義金融利益的統治集團之間底利益如何能够一致並推行帝國主義政策（這種政策必然要使一個國家走向戰爭與毀滅，而同時這個國家的愛好和平的人民則全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與爲什麼會發生）的一個衆目昭彰的例子。

我可以有根據的說，這是極少數的一群人反對世界和平及破壞各國之間的友誼的一種陰謀。

一小「幫」外交人員控制了一強大國家與另一強大國家之間的關係。這個「幫」知道如何巧妙地應用它的勢力就能從容不迫地破壞這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兩國之間的關係愈壞，這一「幫」人的地位就愈有勢力。祇要他們的同僚愈多地相信與這一國家的關係是一個專門問題，需要專門的知識，訓練和經驗，而這些東西唯有他們這一「幫」裏的人才有時，那麼這一「幫」裏的人就愈擢升得高並被放在重要的地位上。

這是個邪惡的集團。這「幫」人利用其日益增漲的勢力去更加澈底的毒害和分裂與另一大國的關係。

假如這事不加以阻止，則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這「幫」裏的人員是歡迎戰爭的，因為他們夢想着佔領地區的有利營業。在他們的思想裏，他們爲他們的國家預定着一次「軍事上的勝利」。

不用說，這樣一個投機份子和反動份子的集團是不能有所作爲，除非它是統一于另一個較大的勢力的利益之中，在這個較大勢力的利益面前，這個「幫」賣力地爲自己的目的服務，同時它的成員也就成爲這個較大勢力底意志的理想執行人。

這是國務院底「蘇美事務壟斷集團」的一般工作情況。「壟斷集團」所服務的較大勢力是以華爾街爲化身的美國資本主義。反蘇仇視行動是替美國財政家的利益服務的，「壟斷集團」的行動是適合于他們的國家軍事化，法西斯的國內制度，對蘇戰爭的計劃的。詳情和事實如後。

在美國國務院與外交機關中「蘇美事務壟斷集團」的領袖與主要人物是誰呢？

勞埃·亨德遜 亨德遜是「壟斷集團」的元老，直到最近，雖然自一九四三年後他的工作與蘇美事務無關，仍力圖在「壟斷」事件中保持決定性的發言權。

認識勞埃·亨德遜的人會形容他是一個枯燥無味的五十來歲的人。他的同僚，一方面尊敬他的地位，顯然認爲他除了一點之外，在各方面看來都是個澈頭澈尾的庸人。他有一種不同尋常的個人陰謀的天才，同時有着一副與此完全不同的外表，使不很熟知他的人們把他當作一個誠懇而坦白的人。

亨德遜的成功，這成功是不算小的，實在並不是因為他有什麼才能，而是由於他的陰謀本領，加上他的事業從開始到現在就一直以陰謀而一帆風順。

亨德遜的事業是在國務院裏充當反蘇事務與陰謀專家時間開始的；從此以後他始終幹着這一行。

他第一次與蘇聯接觸早在他任外交工作以前。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實行徵兵時，亨德遜像某些別的正當入伍年齡的美國青年一樣，躲進紅十字會裏去。這是一種很有效的，雖然是很明顯的逃避兵役的計策。紅十字會的大門對某些有好門子的青年是洞開着的，他們爲了某種理由，大多數是因爲怕死，而不願去打仗。在那時，亨德遜或許還沒有聽說過美國外交工作比紅十字會更好的逃避兵役的計策。

事實上，並不是偶合，在這反蘇集團中沒有一個人會參加過任何戰爭。假如他們必須去打仗，那麼他們一定不會像現在這樣熱心於挑動戰爭的。但事實上他們是能够把他們的政策所引起的『倒霉事兒』推給別人去幹的。他們是不想到前綫去的。到前綫去的不是他們，他們不願意在戰爭中受傷或被打死的！

亨德遜第一次到蘇聯是作爲紅十字會的一位代表。這一組織在那時和現在一樣，是與美國外交界及美國諜報機關攜手合作的，它給這個未來的間諜在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內找到了工作。

當亨德遜熟習了蘇聯，他看到了這裏是一個美國投資者所說的『好地方』。他能預知——而這是用不着大才大智的——在美國政府機構中將無疑的大量需要『蘇聯專家』——或者更恰當地稱爲『

反蘇」專家。

既然這樣想，他便請求，並被派去做外交工作了。在幾次一般初作外交工作人員所做的例行工作之後，他便被派到波羅的海國家去，在那邊他的工作是直接有關蘇聯事務的。

他畧施計謀使自己成爲這個反對蘇聯的間諜機關中的重要人物。甚至在美國與蘇聯兩國建立正式關係以前，亨德遜使國務院負責蘇聯事務的高級官員們相信他就是他們應該把「蘇聯事務」付託的人。他也使他們相信他是應該被預備爲外交工作中的重要「蘇聯專家」。

他被遣回美國去準備與蘇聯建立外交關係，如這類人所預見的，這是必然的事。

亨德遜提出的預備步驟之一是立刻遴選一批年輕「精明」的人訓練爲「反蘇能手」。這一建議爲他的上司所接受而亨德遜就選了三個年輕的外交官員來訓練。

因爲這幾個人現在還是蘇美事務中的重要人物，他們的名字是值得提一提的，他們是喬治、凱南，查里斯、鮑稜和愛德華、培基。

凱南在美蘇外交關係建立之前，曾在資產階級的波羅的海各國中體會了國務院的反蘇政策和得到一些「思想訓練」。鮑稜被派到布拉格，培基被派到哈爾濱，哈爾濱在當時是和布拉格，巴黎，柏林和里加同樣是白黨匪徒反蘇陰謀的中心。

凱南在這些指派的工作之後就被派到柏林去學俄文，培基和鮑稜也以同樣的目的被派往巴黎。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那時無疑地很可能派送這些官員到莫斯科蘇聯人中間去學俄文，然而他們

却被送到這些反蘇中心去跟白黨匪徒份子學習。

這就是國務院「蘇美事務壟斷集團」的開始。它是在美蘇外交關係建立以前經過為期數年的
慎密計劃而組織起來的；它是從第一天起就以取得全部控制這些關係為目的。

很明白的這是在兩大國之間的關係正式成立以前加以毒害的一個陰謀，說它是陰謀是很恰當的。當時國務院中的反蘇領導集團，以亨德遜為首，以凱南、鮑稜和培基為學生，發展到今天一共還不及一打之數的外交官員，和半打年輕學生作為「反蘇專家」的新進。

勞埃、亨德遜本人到一九三三年美國大使館在莫斯科成立以前。一直在國務院，在國務院時，他在華盛頓為這個掌握蘇美關係的組織打下基礎，並且從那時起這個組織即成為東歐事務司。

外交關係剛一建立和莫斯科的美國大使成立時，亨德遜本人和他的學生便馬上進入蘇聯。

亨德遜，與凱南一起（這時凱南已經在柏林和在波羅的海各資產階級國家受完訓），實際上組織了大使館。他們物色美國職員也物色蘇聯職員，建立起大使館的機構，組織大使館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美國大使館在莫斯科成立。原在里加進行的主要間諜活動轉移到莫斯科，但里加仍不放棄為間諜中心。

雖然一部份間諜活動掌握在莫斯科的美國軍事代表們的手裏，但大使館人員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從一開始亨德遜就在大使館周圍造成一種陰謀的空氣，這種空氣一直盛行到今天，並且由美

國大使館散佈到莫斯科某些其他外國使團。

亨德遜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進行他的反蘇活動。他與他的外交官員們試圖在蘇聯人民中招募間諜代理人。

當這種代理人之一被蘇聯當局逮捕時，亨德遜到所有的莫斯科的其他使節那裏去爲『蘇聯當局的兇殘』而假哭一番。他用同樣的虛偽的腔調給國務院送去詳細的報告。當然，因爲很少人知道這些被捕者的真實間諜活動，而這些美國人自然是嚴守秘密的，大使館的一般美國職員受了亨德遜的教導，相信每一個與美國人談話的蘇聯人在第二天就會被捕，很多到達莫斯科的美國人至今還相信有這事情的。

亨德遜與每一個新的大使館職員作一次衷心的談話。告訴這個新來的美國人他將被蘇聯偵探包圍。告訴他若干例子，有些是『真的』，如亨德遜某些代理人的被捕，有些是完全捏造出來的。然後又告訴他說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有女子們給他打電話，她們是蘇聯的特務，他是澈底的受了一番告誡，通常地，如果他很天真，這些美國人中有許多是這樣的，戰戰兢兢地走出了亨德遜的辦公室，而每次離開大使館出去散步的時候總是不時回頭看看是否有人跟踪他。

爲了要使他的話發生效果，亨德遜通常佈置『電話』，這些都是受命于亨德遜的人所幹的事，而且這個打電話的女郎往往會對這個男子流露她對他的一些特殊的了解。於是這個人，驚駭到半死，一連幾個星期在大使館到處談話：『你知道嗎？我到這兒來後剛剛一天，一個女子給我打電話了。她知道我的最詳細的名字和我在美國的故鄉。』他的推測是這個打電話的蘇聯『間諜』

一定是有內部情報的，他站在那裏爲這件事發楞，常常要許久許久才恢復過來。

這種『教育』顯然地仍在進行，而且也並非不成功。

美國大使館的陰謀空氣由于亨德遜的外交官員被鼓勵繼續當着下級職員的面談論『電話』和蘇聯公民被捕等事而更濃厚了。

這些話題成了大使館的大部份的談話資料，任何工作人員——現在還是這種情形——都會感覺到他的影子也在偵探他。這是確實的情形，有些美國人是這樣地爲亨德遜的『鬼故事』和『神話』所迷惑以致必須把他們遣送回國。有好幾次因他們神經錯亂而被送往療養院去休養。

爲了有人會懷疑我關於亨德遜的材料真實性，我還要談到大使館的兩個美國人在那時所告訴我的事。他們說他們如何受亨德遜的指示去恐嚇新來的人。我想若不是他們當時喝多了酒而當我面討論到全部事情，他們是不會對我的，他們談笑着他們所謂的『惡作劇』他們嘲笑很多被他們的無恥的計謀所愚弄的人們。

亨德遜把這個調查制度在大使館安排好以後，便被國務院調回去負責那裏的蘇美事務，這工作他做了五年，從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三的夏天，官銜是東歐事務司助理司長。

在蘇德戰爭開始時，亨德遜犯了錯誤以致有一個時期嚴重地影響了他的專業。

像美國政府的其他『蘇聯專家』一樣，他們是受願望而不是受事實所指導，他預測蘇聯將在幾個星期內爲德國打垮。他不願在對德戰爭中，兩國有很明顯的共同利益，而勸阻美國與蘇聯建立任何密切的關係。

事實是，白宮方面不得不直接來干涉蘇美事務。白宮挽救了這個情勢和糾正了這一可能犧牲百萬美國人生命的不可彌補的錯誤，這個錯誤將必然地阻礙或延遲蘇美之間的合作若干年月，而這種合作在最後打敗德國中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亨德遜的竭力破壞美蘇合作激怒了白宮，致使他被派到伊拉克去當巴格達的美國公使。

但亨德遜是永遠不服輸的，他對每一件事都胸有成竹。到了天方夜譚的誕生地，他就像阿來汀一樣拿出了他的神燈來。說時遲那時快，一個魔神就出現了。亨德遜在伊拉克的發現一如他在別處所發現的——紅色的威脅。

無疑的假如亨德遜被派到南極去當美國間諜，在一年之內他定會在企鵝中間發現『紅色的威脅』。

亨德遜的關於巴格達有共產主義危險的發現使得國務院要人們對他窺視起來，不久他便被召回，任國務院的中東事務司司長這兒他又有另一『發現』——即不但在伊拉克而在整個中東都有紅威脅。

在這個職位上，亨德遜期待着對希臘民主運動積極作戰的所謂杜魯門主義。

亨德遜也發見了石油如何能有效地不僅可以滑潤機器，而且可以滑潤國務院。在中東美國石油公司的直接影響下，亨德遜指揮了美國外交的又一轉變——對巴力斯坦的政策改變。改變的結果美國要求更改它本身所主持的聯合國決議。

我正寫到這裏時，得到報告，亨德遜被任為美國駐印大使。有理由可以預料在半年之內在勞

埃、亨德遜先生的幫助之下國務院將有一個轟動的發現，即「共產主義威脅着印度」，無論如何亨德遜的事業並沒有終止，而關於他的最後消息還沒有聽到。

喬治·凱南 此人是國務院中經常提到的：「他是比在著名訓練到蘇聯工作的德國諜報人員學校——東歐學院——學俄文的任何其他美國人更知道蘇聯的。」

這恐怕是從一個人的傳記中所能找出來的最典型的事實，即這個人的全部事業說明他對於蘇聯的知識不是從莫斯科而是從柏林得到的。

凱南說的俄國話有很顯然的外國口音，他說德國話就一點聽不出外國口音。

甚至在一九三四年凱南到達莫斯科之後，他也不是在他周圍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高速度進行中，而是在另外一些地方去繼續尋求他的對蘇聯的「感悟」和「瞭解」。在國務院中盡人皆知凱南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工作時，他的最好朋友是德國大使館外交人員和軍官們。他從他們那裏聽到蘇聯的一切，並且是從他們的希特勒匪徒的眼鏡中來看他所要研究的國家。

因此，這是不足驚奇的，這個「蘇聯專家」對蘇聯的了解是從來超過他的教師的，而現在他幾乎恰恰在試圖重複那些法西斯軍官，外交家和間諜們所犯的不幸的錯誤，這班人甚至在那時即夢想着和計劃着如何在三個月內征服蘇聯。

凱南在最初開始他的外交職業時，那是在二十年前，為國務院重要官員小集團挑選為「有前途的人」，是注定了要成爲一個對付蘇聯的「首要外交專家」。這些官員預見到，儘管他們如何努力，美國是不得不與蘇聯建立關係和在莫斯科設立大使館的日子終要到來。

因此，他們決定，必須選擇和訓練精明的青年，這些青年在他們的協助之下將能够盡量建立和保持對蘇美關係的牢固的壟斷。

對這些青年的挑選，當然是準備自己當這一集團的領袖的，勞埃、亨德遜，亨德遜的第一個選擇是凱南，凱南是大大地符合了亨德遜的期望。

從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三年期間，除了他在德國學俄文那兩年，凱南是駐在波羅的海各國，當時是在美大使館莫斯科設立以前，那裏是美國對蘇聯的間諜中心，凱南毫無困難的適合這個組織，因為他具有做諜報工作的天然傾向。

他是一貫贊成用歪曲和假造情報的方式，這是美國間諜對蘇維埃發展底事實的典型方式，凱南在第二次大戰前曾兩次到蘇聯。第一次是美國大使館在莫斯科成立時。凱南自爲大使館挑選了一批本地職員，負責把原先在里加進行的某些「活動」部分的移到莫斯科去。這些「活動」是什麼是用不着內部情報就可以猜到的。

凱南第二次到莫斯科的任務，因約瑟、戴維斯大使的來到而弄得非常不愉快。如所週知，戴維斯對事實比對凱南和亨德遜的虛構故事更有興趣，這就跟這兩個個人（當時都在莫斯科）的計劃難以相容。戴維斯到達後不久，凱南即離開莫斯科。曾有人說祇要一提到有一天戴維斯或將被派到此間做大使的話，就會使凱南得神經性頭痛病和失眠症。

慕尼黑協定之後，凱南被派往布拉格。據說跟哈查偽政府關係很親密，在這以後凱南被派往柏林，一直到美國參加了對德作戰爲止。

在戰爭期間，無疑的凱南是度着他生命中最倒運的日子，在這些日子裏他想到他的全部計劃已化爲烏有了，因爲美國與蘇聯同盟對抗德國，爲打敗希特勒而並肩作戰。他的近友說凱南在這個期間胃潰瘍症發作，當蘇美聯盟日益鞏固起來，他的病益也愈劇烈。

據我的判斷，凱南在一九四四年接受莫斯科美國大使館顧問的職位時懷有很大的疑懼，他顯然很擔心這個工作，不管他喜歡不喜歡，是必須要去迎合兩國之間的那種良好關係的。

但是，到了莫斯科，他發現得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這個位置有很大的可能毒害這種友好關係，這種新勢力在羅斯福死後就很明顯了。

凱南得到大使哈里曼的大力支持，哈里曼沒有來得及等到羅斯福去世即背叛了他的政策。我確知凱南天天不斷的寫發許多電報，和許多報告給國務院的新領導者。

他開始證明：

- 一、美蘇友好是一個錯誤，美國和蘇聯是決不能和平相處的，儘管在戰時的聯盟很成功；
- 二、蘇聯政府堅決要『統治世界』，立即要使『歐洲布爾什維克化』；及最後侵略美國；
- 三、美國必須在一切問題上「抗拒」蘇聯，不管多麼微小，並拒絕與蘇聯政府成立協議，因爲『與蘇聯協議是不實際的』；

四、德黑蘭協定，雅爾塔協定和後來的波茨坦協定（儘管瘋狂勢力，凱南終於不能阻止這些協定）是嚴重的錯誤，美國必須推測它在這些協定中所承擔的義務。

凱南的電報和報告得到國務院的高度的注意。並倍受讚揚，實際上，它們成爲新國務卿貝納

斯的聖經，爲國務院中一切決策人員及其他許多人，同樣的爲在世界各地負重要使命的人所必讀。

一九四六年我到蘇聯去以前，我必須要在國務院那座舊樓裏去聽八到十星期的講課。講課每隔天早晨一次。大約共有二十個至二十五個講師，主要爲曾在國外呆過一個時期的外交官員。他們研討他們的經驗並回答我們的問題。這些講演之目的在於賦予國務院到國外去的職員們的未來工作以一種反動傾向，同時也教他們如何收集機密的情報並「使他們耳聽六路，眼觀八方」。

喬治·凱南講授蘇聯外交政策和在蘇聯的工作情況。他的講辭中充滿了惡意的和反蘇的攻訐。在我們全體反動的講師中他可算是最反動的一個。

代表財政和軍事集團的華盛頓的侵畧性的反蘇份子們覺得凱南恰恰是他們所要尋找的人。他們在羅斯福死後用欺詐手段而不是合法選舉的結果而控制了美國政府。

凱南能比他們自己更好表明他們的意見，並且特別是能够從莫斯科權威的有利地位上來說話，這乃是使他的言論被重視的一個事實。

所以，凱南出乎意料之外地突然被稱爲美國新外交政策的首要思想家了。

這個地位在一九四七年他被國務卿馬歇爾派任爲政策計劃委員會的主席時正式形成。在這地位上他是奉命規定「可預見之未來」的美國政策之原則並幫助現行政策的執行，他常常向國務卿馬歇爾進言並能對他施以巨大影響。

在有些場合他甚至成爲國務院意見的正式發言人。不久之前他以無名氏的名字在外交雜誌上

刊登了一篇文章。爲保證美國報紙不致低估這篇文章的重要性，某些新聞記者洩露了秘密。此事引起了轟動——如原來所打算的——結果是凱南的論文，在美國和國外極廣泛地爲人閱讀，如果用他自己的名字發表則定不會如此。

外交雜誌上凱南的論文是人所共知的。這個國務院的領導官員所私下發表的見解是在莫斯科美大使館中被公開地廣泛地討論了。

凱南堅持『美蘇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他不相信『美國能容忍以蘇聯爲化身的勝利的社會主義』的繼續存在。

他認爲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主張戰爭的到來愈快愈好。凱南把所謂的『強硬』政策或『冷戰』看作是挑起大戰的手段。他所主張的『遏制』共產主義的政策乃是美國應佔領全世界的另一說法。

凱南是一個根深蒂固的親德份子，他是力主重新武裝德國，稱德國是美國進攻蘇聯的矛頭，凱南是向來主張西方集團的，他寧願讓德國而不讓英國爲這一體系的領袖。必須說，凱南的思想，一般地是與希特勒的某些『哲學家』的思想驚人地類似的。

凱南和他的國務院『蘇美事務壟斷家』集團中的伙友們一樣寄莫大希望於原子彈。他把它看作是對共產主義的最後的答復並夢想用之于蘇聯的城市。這與凱南底同僚們的計劃和希望是完全一致的。

實現凱南的挑撥與擴張主義計劃的首要困難，除去蘇聯本身的有遠見的政策以外，自然，是

美國本國。凱南很少住在美國，更了解與他一生消磨的外交社會有別的一般美國人的善良感情，也同樣憎惡羅斯福及他的國內國外政策。

他甚至憎惡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代議制的政府，這個政府，儘管有它的缺點，在某種程度上，仍強制美國外交官員向公眾說明他的行動。他埋怨有一個國會，這個國會能够干涉「較高智慧」底活動，凱南自信是有這種智慧的人。他一想到還有一群投票人就氣憤得發抖，歸根結底這些人能够僅以拒絕同意就可使他的聰明計劃化爲烏有。

凱南明白美國的老百姓不要戰爭，因此，他在公開的談話中，努力使聽衆相信他的政策是引向和平。但他却無時不在提議引向戰爭的步驟。

凱南對於美國的馬戲班主 P. T. 戴爾納姆「每一分鐘有一個惡人出世的原理」，比對林肯的「你能長時欺騙某些人，你可以暫時欺騙所有的人，但你不能長時期欺騙所有的人」的道理懂得更好些。

戰爭歇私的里亞，如戰爭本身一樣，是一種澳洲土人的投擲兵器，投擲這種武器的人常常打着自己，凱南和他的集團在美國製造了戰爭歇私特里亞，現在他們必須要使它繼續喧騰不已，以便避免他們所代表的政策和他們個人的事業受到毀滅。凱南和他反蘇政策的黨徒，是處于最危險的地點，因爲對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的威脅，現在比以前任何時候更真實。這就是爲什麼要寫這一個在別的情勢之下不值得寫上十五個字的詭計的人。

查里斯鮑稜，鮑稜在反蘇外交集團中並不比德遜寧和凱南不重要。他在國務院中一般地被稱

之爲「機伶」，一個僅僅意味着敏捷的思想加上過度的機會主義的字眼。

鮑稜早在一九三〇年在巴黎學俄文。然後，並未依照常例到波羅的海各國去受訓而是直接被派到莫斯科新成立的美國大使館去，他在那裏在亨德遜和凱南的手下工作了幾年。

他曾一度派到國務院工作，但在一九三七年又回到美國大使館並留在莫斯科直到一九四〇年。在此期間他有相當一段時期是大使館「蘇美事務壟斷集團」的「代表」，因爲亨德遜那時在華盛頓處理着蘇聯事務，凱南則在布拉格和德國。

但是，鮑稜雖負此重責，顯然地亨德遜在當時並沒有把他當作他的秘密團體中的一個要員。他退後來才得到機會的。

一九四三年亨德遜被逐出蘇聯事務工作而被派往伊拉克之後，「壟斷」集團面臨到一次嚴重危機。必須在「壟斷」集團裏面找到一個不但可以將事情交託處理的人。而且懸于白宮對蘇聯事務表示了熱切的興趣，還能够得到羅斯福信任的人。

鮑稜被選上了，與鮑稜同時，還有一個更年輕的官員，萊因哈特，被放在負責地位。但當萊因哈特被派任其他工作時，整個「壟斷」集團便由鮑稜負責。以鮑稜爲美蘇事務的新血液而推薦給白宮的準備工作是巧妙而審慎的。當需要爲白宮與蘇聯代表作高級談話找一個翻譯員時，機會就來了。

鮑稜以「翻譯」資格被推荐给羅斯福，他被稱爲國務院中「唯一」適合這一工作的人，雖然在華盛頓政府中無疑的還有許多懂俄文比鮑稜更高明些的人。

在外交界裏鮑稜是彼認為有可愛的性格和一種相當的『迷人的外表』的。希望這種『迷人的外表』加上鮑稜的『敏捷的思想』會把羅斯福誘入爲他準備下的陷阱中的。

果然行之有效。羅斯福顯然有些喜歡鮑稜；他想他是個有能力的年輕人，可以付託以相當大的責任的。

一九四三年鮑稜被帶去參加莫斯科會議，隨即任東歐事務司司長，之後，在一九四三年秋羅斯福又帶他去參加德黑蘭會議。一九四四年下半年，鮑稜的地位強大到可能出任與白宮作聯絡的國務卿特別助理。

鮑稜在羅斯福死後仍保持着國務卿特別助理的地位。他成爲『蘇美事務壟斷集團』的重要人物，他在參加的會議中名義上是個翻譯，實際上他可以對蘇美關係提出重大意見。

鮑稜以他的雙重地位，翻譯同時又是顧問去。參與每一次高級國際會議他參與了波茨坦會議。此後，這個詭譎的外交官出席每一次外長會議，包括在莫斯科開的那一次。現在他是被全國務院公認爲蘇美關係的『卓越專家』。

回顧鮑稜的最主要的事情，是他盡其所能，小心謹慎地去暗中破壞羅斯福的對蘇政策。代表他的『壟斷集團』，鮑稜，裝成一個自由主義者和努力爭取蘇美之間的諒解，常常爲後來完全拋棄羅斯福的對蘇政策做預備工作。羅斯福死後，他大肆活動來破壞在戰時建立起來的兩國友誼。這個人一心一意和深思熟慮地，而且完全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

進而言之，他以總統的蘇美關係私人顧問的資格，能够很大程度地控制國務院中蘇美事務

的重要職位人員的委派。是他出力使杜爾布勞受命爲國務院東歐事務司他的助手，並且，據我所知，也是他，在他自己擢陞後使杜爾布勞任該司司長，後來他又幫助杜爾布勞任莫斯科美大使館的顧問。

一九四四年鮑稜也力助凱南出任莫斯科大使館的顧問，並且，可能也有助於凱南後來任命爲政策計劃委員會主席。換言之，甚至在羅斯福逝世以前，在一九四四和一九四五年，鮑稜即已將『壟斷集團』之成員安插在主要職位。用這方法，他準備回復舊的仇蘇政策。

鮑稜在美國，被美國報紙描述爲有名的德國軍火製造者——克魯伯·馮·鮑稜家的後裔。這一說很可能是假的，但無論如何有一點是真實的。如果說鮑稜確係代表在美國的克魯伯，馮，鮑稜的家庭的，他也不能比現在更成功地代表他們的利益及一切大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的利益了。

從他的履歷上看來是很清楚的，他是一個『內部代理人』不但爲了『蘇美事務壟斷集團』及其狹小的利益，也是爲了華爾街和美國財政界的權力，他們會一再申述他們不能忍羅斯福所計劃的蘇美友好和聯盟。

愛爾布瑞吉·杜爾布勞，關於杜爾布勞我在本書另外一章詳述。他在一九三四年被派往莫斯科美大使館時與『壟斷集團』發生關係。

從那以後，他成爲這個集團的主要的最親信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多次歷任高級的負責的職位，而且能有效地代表他們的利益。

查爾士·泰葉是鮑稜的小舅子，是西點軍校的畢業生。現在他是負責紐約廣播的美國之音。

他被選任此職是因為他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在蘇聯美大使館工作的「經驗」。

泰葉在美國之音中代表着「壟斷集團」。他是這個集團中一個「有前途的人」，他很有可能不久以後聞名于世。他有一切可能將担任國務院和國外蘇美事務中高級的重要職位，到那時他將努力實行他的朋友及親戚的反蘇政策。

愛德華·培基在很長一段時間以蘇美關係專家的資格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及國務院中服務。他最初是和鮑稜與凱南一同受訓的，是亨德遜底「壟斷」集團的學生，藉此而得任要職。

弗來德力克·萊因哈特。關於萊因哈特我在別處將加以詳述。他是這個討厭的人們的集團中最討厭的一個。人們對他與對此集團中其餘的人同樣鄙視，如果不是更甚的話。這個缺德的人當然會在國務院中得到很好的職業，尤其是在美蘇關係這方面。很有可能他將繼續任該職一個時期。

法朗西斯·斯蒂文·斯蒂文是該集團中另一成員，六年以來担任蘇美事務的重要位置。據他的官職履歷，他的俄語是由國務院訓練的。

里查德，戴維斯，戴維斯在我以前就在美大使館工作，曾經在國務院蘇美事務部分任負責職務。他還不是這個集團的正式成員，但正在努力爭取成爲一員。

處在戴維斯這樣一個位置的人，如果他同意惡毒的反蘇政策，他將被接受爲這個集團的一員，否則，他將在一個隨便的藉口下被一脚踢開。

劉維林，湯姆生，從我在大使館中所聽到的來判斷，湯姆生，未必能算爲「壟斷集團」的正

式成員。但他與他們合作，現在他在國務院任要職。

約翰·戴維斯，戴維斯是遠東專家而不是蘇聯專家，雖然他曾在蘇聯住過兩年（一九四六—一九四七）。

然而，約翰·戴維斯却是說明『蘇美關係壟斷集團』如何以接納處理其他地區的人物來擴張其活動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美國大使館中我是直接在戴維斯領導下工作的，因而知道他很清楚。他和這個集團中的其他人一樣，非常醉心於個人事業。他不惜用任何卑賤手段去推進他的事業。

戴維斯生長在中國，並在中國讀書，他是個東方陰謀專家，並如中國政客一樣地思想。這樣當然對他有利的，因為現在的美國外交與反動的中國政治之間是有許多相同之點的。

其次，戴維斯受他妻子的影響很大，她的聰明不亞於他，對他的事業有同樣興趣。他的妻子是美國資本家和政客亨利·格萊第的女兒，亨利·格萊第近年來被挑選去做各式各樣最討厭的須要狡猾和一種不光明的手段的外交工作。

在大使館，戴維斯是凱南與杜爾布勞政策的主要執行者。他控制美國新聞處和『新聞報告』。戴維斯受命于凱南及杜爾布勞去搜集全大使館的職員與蘇聯人接觸的情報，以及有關彼此間的情報，他的妻子是最熱心的助手。

戴維斯有一種走狗的性癖，經常被派去做本地的大使館事務中有挑撥性的任務。他是奉命破壞某些職員和官員們的地位以準備他們調離莫斯科。例如，戴維斯被派去搞掉阿爾蒙，威里斯，

而這一任務他是幹得很成功的。我是親自看到這事情的，所以我將另行詳細敘述。

戴維斯也受美大使館之命，爲了獲得情報及可能的挑撥性目的去與在莫斯科的美國新聞記者接近。

差不多每次我走進戴維斯的辦公室都看到有一兩個記者和他在一起。他有次序地利用若干記者設法從蘇聯發出關於發展的歪曲的報導和挑撥性的謠言，他有次序地將所有他自己的和大使館其他官員們的秘密報告和電報供這些記者使用。他鼓勵這些記者摘錄這些報告，以便將來他們回美國去作爲寫文章的材料，這當然是爲了直接影響給予美國公眾的關於蘇聯的情報的。

然而這類事情中最爲罪大惡極的例子，是發生於一九四七年莫斯科外長會議的時候。戴維斯命令他的一個下級職員，一個女書記，她也供給他關於大使館其他美國人的情報，積聚一大堆細心選擇的關於蘇聯的假報告以備幾十個到莫斯科的記者之用。這些記者名義上是爲了報導外長會議而來的，但，他們之中多數是由各報館派來收集些謠言和臆造作爲『記者們實地獲得的關於蘇聯真相』以饜美國報紙的讀者。

在整個會議期間戴維斯鼓勵所有的美國記者閱讀這些報告並且寫摘記，甚至抄錄全文，這些東西後來以『新穎的觀察』發表。在這期間他以全部時間與記者們在一起，他將他自己的特種的關於蘇聯的蘇維埃生活的聰明說話教給他們多數的記者聽了，並將他的說話原文照發。他們很高興他們可以不需要自己絞腦汁去捏造。

我相信，戴維斯決不是一個職業間諜；或者是一個職業間諜而不是一個十分有經驗的。例如

，戴維斯派大使館官員之一在領事組有次序地接見所有的「有趣人物」，他們是作爲美國公民資格請求者而來的。

這個名叫華萊士的官員，（後來爲了牽涉在一場險些打破了頭顱的醉酒的爭吵中，被大使館逐出莫斯科。）他將把這些「會見」報告戴維斯。戴維斯常常在這些會議裏面加進許多反蘇的捏造，通告所有他的朋友，這些朋友又告訴全大使館。

戴維斯也親自詢問某些來到領事組的人們，竭力想得到適合於他的反蘇路線的「情報」。

約翰·戴維斯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的工作卓有成績，因而被寬恕了以前的錯誤。這些錯誤是由于他在中國採取被人認爲有利于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所造成。當然，實在地戴維斯並不是有利于中共而是通常的兩面政策而已。他的希望是爲國民黨政府及美國在中國國內政治中搞出一樁絕佳的間諜和挑撥事件。不管怎樣，他犯了錯誤，以致聲名狼藉，甚至在美國人中間也如此，成爲對中國政治中的親共份子，當駐華美大使館大批清洗人員時他被調離中國。

戴維斯又得到了帶罪立功的機會，他被派往莫斯科。他在那裏的惡意的工作引起了「蘇美關係壟斷集團」的特別注意。他贖了罪。

當他離開莫斯科到華盛頓時，得以在凱南領導的政策委員會工作。從這個優越的地位，他能够更大規模地實行他的陰謀。

國務院「蘇美關係壟斷集團」正在迅速擴張他的人和勢力中。他的最終目的當然是控制國務院一切政策的指導權。

爲了預備一隊「反蘇專家」的後備軍，而佈置訓練大批青年外交工作官員。這些直接在「壟斷集團」首腦的指導下工作的青年官員，將要在國務院和莫斯科美大使館中佔很重要的職位以便執行「壟斷集團」的命令，等將來現任首腦們退休時，他們將最後控制這一「壟斷集團」。在這一隊學員中間，少數的幾個「最幹練的」突出人材，已顯然注定了在將來要担任首要職位。「壟斷集團」是如此計劃着他們的反蘇活動的。

第三章 我到莫斯科

我很高興能夠有機會到莫斯科美大使館工作。童年的時候，我聽到過許多關於俄羅斯的故事。對於我，它好像是一片神秘的、遙遠的、有魅力的地方。後來我就醉心於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普式庚的作品，雖然在翻譯以後，它們已失去了一部份動人之處，可是，在某種程度內，它們使我得以認識到我們知道得很少的俄羅斯人民的生活。

因為我受的是美國學校的教育，看的是美國的報紙和雜誌，就不自覺的在某種程度上吸收了為這些「自由」出版物上登載的關乎蘇聯的惡毒胡言。同時，我覺得美國報紙在寫蘇聯生活時與客觀立場相去甚遠。

很難令我置信一個對世界供獻了羅蒙諾索夫，托爾斯泰，與普式庚那樣天才的國度竟是如此充滿了惡意與惡行，如我國赫斯特系報紙及類似的報紙雜誌所謗諸蘇聯的，那樣罪惡多端。

一些關於蘇聯政府在公共教育，公共衛生，社會安全與婦嬰福利方面活動的新聞引起了我的注意，雖然這些新聞也常常是有些歪曲的。從單純的邏輯觀點來說，這種零星的報導在穿破美國統治階級為要阻礙普通美國人真正知道蘇聯實在情況而創製的「鐵幕」上，是有其成就的。

在相當的時期內，我開始領悟到在美國所以如此猛烈傳播着反蘇聯的造謠毀謗也可以全然用同樣的邏輯事實去解釋，那就是，六十大家中掌握了一切政治的與經濟的權力，非常怕蘇聯的榜樣是會有「傳染性的」。如果普通的美國人發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裏的老百姓，能够比

資本主義社會生活得更好，和享受更大程度自由的話，也許他們會企圖將美國所有的生產手段和政權都拿到他們手裏。在我看來，恰恰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美國統治階級要盡其全力在美國人的眼中將蘇聯生活方式橫加詆毀。

這個思想的確還在胚胎階級，雖然我已經本能地感覺到是如此，但是幾年來在美國學校所受的教育並非一點不留痕跡。我很難列舉所有美國學校在「情報」的名義下教給學生的那些關於蘇聯的胡說亂道。我懷疑是否有此必要。

一個在美國學校念書的普通人，除非他採取特別的辦法去找出關於蘇聯的真情，不然他所得的印象就會是：蘇聯是一個粗野，落後，與優畧的國家，美國的統治階級重視陳舊的做廣告的口號：「美名遠揚就是反覆宣揚，」在報紙上，無線電裏，用飛機在天空寫字等經常反覆宣傳優點的辦法，可以為一個商行或是它的產品創造好名聲。這樣做去，甚至於毫無根據的斷言也會使美國公眾對它有印象。

比如、美國的所有街頭和公路上，無數的廣告牌宣揚着可口可樂的值得欣賞的品質。千百萬美國人盲目地相信可口可樂對健康有益，而且「使你神清氣爽」，却不願美國醫務協會雜誌常常公佈的材料說可口可樂溶解牙齒的垢瑣質這一事實。祇發行幾千份的一種雜誌是不能有效地和數百萬份在廣告牌上，在報紙上，在無線電裏歌頌的可口可樂的假品質廣告來競爭的。

美國統治階級的反蘇宣傳根據這同一廣告的原則。他們相信重復關於蘇聯的毀謗捏造的不同說法，如果經常重復得夠，結果就會為普通美國人接受當做實情。美國統治階級知道大多數的美

國讀者不會看到進步報紙所發表的關於蘇聯的眞事。這是因爲這些出版物發行的數目少，並且因爲缺少足以出版刊載各個國家實情的較大進步報紙的基金。

美國的報紙能够印行反對美國進步團體，職工會，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無數毀謗資料，在這種意義上說，美國的報紙是自由的。

當我同意在莫斯科工作時，我這樣做是基於我要知道，蘇聯及其人民的真實狀況的素願。

在反抗法西斯野獸的戰爭期間，我屏息地留心蘇德前線的發展。在保衛他們故鄉中的紅軍戰士的傳奇式功勳，莫斯科，斯大林格勒，與列寧格勒的劇烈戰爭，將德國侵略者之逐出蘇聯領土——所有這些，使我得到的結論是在這種史無先例的情形下去保衛他們國家的光榮與獨立的人民不會是像美國學校，報紙與雜誌令我們所想的那麼壞的一種人民，祇有愛他們國家甚於自己生命的人民才能如此地去保衛祖國。

當我尙在美國時，我就了解這點了。我要親眼看見蘇聯和它那些消滅法西斯野獸——我那時這麼想——的人民。我毫無疑問的體會到在托爾斯泰和普式庚的人道主義與在蘇聯所實行的人道主義中間的連續性。

我決定忘掉美國報紙、雜誌和學校所告我的關於蘇聯的任何事情，以便有機會得到在蘇聯生活的直接知識，得以認識蘇聯人民並得由正確的結論。

美國人喜歡稱俄羅斯爲一個大悶葫蘆。就某種程度言之，這個國家對於我也是一個秘密。我要解答這個秘密。我要了解使俄羅斯由一落後國家變爲在反抗最殘暴的與裝備最好的帝國主義國

家戰爭中所得戰爭勝利的世界強國，其原動力是什麼。

所以，我來到莫斯科。

我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的工作是我在外交方面的第一次工作。這是我在國外第一次任職，以前我也未曾在大使館或領事館工作過。

我在美國空軍與戰畧服務處工作期間，經過我手的文件證明國外的美國大使館和領事館在某種程度上是從專於諜報活動的。我們常常接到來自不同國家的美大使館並稱為「絕密」的報告，包括關於這些國家的政策，經濟形勢和兵力的情報材料。這些是由大使館的官員所寫的。

在諜報機關工作，我也許是天真地以為諜報工作祇是大使館工作的一小部份，大使館的主要工作是致力於改善美國與我們大使館駐在國之間的關係。我也以為我們的大使館是組織關於它們駐在國的情況的公開得到的與客觀的情報之傳遞。一般說來，我以為美國大使館的職員，做為美國人民在國外的「耳目」，在他們工作中應當客觀，因為美國與美國人民的利益要求關於許多國家政策的真實而客觀的報導。

我也以為美國大使與駐外大使館職員應該竭盡才智以保持與駐在國政府的正常政治與貿易關係。沒有這種客觀上的接近，就不可能結束紛亂，結束和創造一個鞏固並繁榮世界的努力相抵觸的相互誤解及矛盾。實際上，如果一個駐在某國的美國大使館在它向它政府的報告內時常歪曲那國政策之事實，比如說它對美國有侵畧的意向的話，而在事實上並非如此，那麼這種有傾向的、不容觀的情報結果就會使美國人民的利益受到難以挽回的損害，恰恰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我以

爲對於它們駐在國的一種客觀態度，與冷靜地紀錄公開得來的事實，以表達出那個國家的真實政策的特性乃是美國大使與他們的僚屬的工作之主要部份。

我必需承認當我在大使館開始工作時，對這方面我是非常失望的。

當我在大使館最初的時間，我明白不僅是大使，顧問和秘書們，——換言之，即稍稍能够決定國務院對蘇政策向那些人——而且甚至於大使館不同部門的某些碌碌無聞的職員們的見解也是極端反蘇的。在某些場合，他們對蘇維埃制度的仇恨是病態的。

大使館是小型國務院的真實縮寫，我是明白這事的。大使們來來去去，正如國務卿們，但在大使館的重要位置如使節團的顧問與秘書們則多年以來都在國務院的最高反蘇集團手中，即凱南，杜爾布勞，鮑梭，萊恩哈特和其他的人們。這些職業的外交人員在決定實現國務院的反蘇外交政策之方法上起着主要的作用。

現任美國駐莫斯科大使。W、B、史密斯是一個職業的諜報官員。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是與美國軍事諜報機關直接、聯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史密斯以艾森豪威爾的參謀總長資格指揮在歐洲戰場上美國遠征軍的軍事諜報活動。值得指出的是甚至於在駐蘇美國新聞處出版的「美國人」雜誌（我離開大使館以前，這出版物的助理編輯是我的職務之一）第一期上還印了史密斯將軍的一幅像，標題意思說他是「一個從事諜報工作富有經驗的和卓越的組織者。」很明顯的，國務院所以指派一個富有經驗的諜報工作者做駐莫斯科大使是爲了要給它的職業外交人員在他們從事反蘇諜報工作中以必要指示及適當的領導。

我了解到我在大使館的工作實際上是繼續我來到莫斯科以前所服務的同一課報機關的工作。唯一不同之處是在美國時，我是處於接受方面的，即是在從事研究與傳播由國外得到的諜報材料的機關中服務。而在莫斯科，用一個軍事名詞來說我却是身臨前線，在一個做實際收集諜報的機關裏服務。

事實上，所有由大使館傳達到國務院的情報都是極端偏頗的。蘇維埃內政的與外交的政策以及在蘇聯所發生的一切事件和事實常常爲大使館最高領導方面——其中包括史密斯大使，杜爾布勞頓與一等秘書戴維斯及萊因哈特——的極端反蘇態度所滲透。輪到國務院把這些假情報傳給美國人民以前，則又加以誇張一番。

由於與大使館一般職員的談話和我自己的觀察，使我很快地就判明那些在他們工作中對蘇聯採取，或意欲採取客觀態度的大使館職員，不久就會知道他們必需改變他們的態度，若不就：：他們了解假如他們不改變思想，他們就將被召回，並免除文官職務，在美國這是幾乎與死刑相等的——種命運，因爲沒有一家私人商行會給因「對美國不忠」的罪名而被洗刷於文官職務之外的人以職業。

這曾經是許多美國職員的經驗：聯邦調查局的挑唆行動之直接結果就使他們被開除，不得再做政府工作。這些人，未經提出反對他們的任何確實罪狀、他們在政府的工作，就被免職了，在私人商行中也找不到工作。

當我說那些對蘇聯採取客觀態度的人時，我並非指那些職業外交人員。他們常是完全隱於幕

後的。照例祇有最反動的份子才被送到國外工作。我意中所指的主要還是那些人——他們在國務院的工作是有些偶然性的，那些因國務院外交工作在戰時攪動的結果，在戰爭期間才起始工作的人們。這些人來自美國各大學及科學院，雖然國務院已盡力在可能的候選人中間選擇最反動的。

愛爾布瑞吉，杜爾布勞是駐莫斯科的美大使館顧問，並且在最近兩年中均任此職。他的崗位是大使館裏最重要的崗位，他是代表國務院反蘇集團的。

杜爾布勞有一種特性，這特性是所有見過他的人都以很快就覺察到的。他有一種壓倒一切的慾望，而且關於這個，他不能保持緘默。杜爾布勞以一種可怕的，惡毒的，過度的恨，以時常支配着他使他不自制的憤怒與情緒去仇視俄羅斯、蘇聯，和任何屬於斯拉夫的事物。

我不能夠解釋他這種情緒由何而來，它的背景和心理根源是什麼？甚至於史密斯大使——他對蘇聯的態度大非客觀的——也會完全屈服於他的魔力之下。

再說一件事就夠了，甚至於那些在駐莫斯科大使館的美國人——那些純然保持大德態度的，及每天受到最新的反蘇捏造或謠言所薰陶的，及在許多情況中他們本身都極為反蘇和反俄羅斯的人們——甚至於他們也都不能習慣於杜爾布勞的情緒之「激烈程度」，並會為之吃驚的。

他們很習慣於美國外交人員的通常職業的反蘇主義，大部分為了升級的目的而採取這種主義，並且他們對喬治·凱南的過於小心表達出來的「意識形態」則頗有印象。但杜爾布勞則非他們所能理解。

這位足智多謀，短小而靈敏充足的人是陰謀詭計的大師，他常滿面笑容，有一種詼諧的神氣，同一種由衷似的見面熱的神氣，給人一見的印象是一位誠實而有禮的人，許多被杜爾布勞的詭計所斷然解職的人直到最後還在堅信杜爾布勞是他最好的朋友。

但是絕非所有到過這裏的美國人都被這位實際上相當明朗的人欺騙過。許多人瞧透了他，而且事實上甚至在駐莫斯科大使館的美國人中間，惟則他們贊同杜爾布勞的政策，也有許多人嫌惡他輕視他。如在莫斯科的一群胡調的美國人中間，提到他的名字時，罕有不聽見一句虛情假意的批評或只是惡意的一笑。因為許多美國人都祇是笑話杜爾布勞。他除了他的其他才能之外，且是一個有表現慾的人。在任何一个會上，他堅決要求做注意力的中心，甚至於如果爲了達到這目的，要他在屋子中心把衣服脫下來，他也會這樣做的，他的滑稽舉動是旁人望塵莫及的。

一九四七年秋天在大使館有一次化妝跳舞會，杜爾布勞化妝馬戲團大力士出場，穿着緊身衣，上面到處用口紅塗上相稱的字跡。他整夜靈斷了全場，不給別人以露演的機會。

如果在這樣的時機人家笑他，那麼，部分地自然是因爲不爲大使館的一位顧問堅決要做一個小丑而發笑是不禮貌的，另外還因爲他是可笑的，甚至於更因爲他實在是滑稽，並且如果他喜歡這個角色，他當然應該在馬戲團去服務而不應該到國務院來，因爲照我看來國務院不是小丑們呆的地方。

但這個小丑事實已經在國務院的內部會議席上爬得相當高了。

如果杜爾布勞以先沒有機謀進入國務院做外交工作的話，他也許今天會在美國從事於卑鄙的

政治活動或是黑暗的律師業了。他也許會收入甚豐而名譽甚壞。對於他前者此後者要重要得多。

但因爲事實如此，他就能够以他的手腕利用國務院去做大大小小的訛詐。他就因爲這點本領而被評價很高的，的確，杜爾布勞和他的陰謀對於國務院反蘇集團來說正如喬治·凱南與他的「哲學」同樣重要。反蘇集團採取一切的樣式使空氣惡化，杜爾布勞就是其中的專家之一。

杜爾布勞是國務院反蘇集團的一個下級夥友。多少年來這一集團從未完全地或誠心誠意地接受他，因爲這一集團對於每一力求進入他們中間的新人都是表示嫉妬的。

他的外交生涯起始於被委派到華沙和布加勒斯特，一九三四年才被引用於蘇聯。他在莫斯科服務三年半，並與勞埃·亨德遜與喬治·凱南樹立了密切聯繫。

但是，杜爾布勞並沒有感動亨德遜給他，在對蘇外交上以進一步的任務。戰爭爆發以後，他才被召回，很明顯地那是鑑於訓練從事此種特別活動的工作人員的一般缺乏，而作爲一種試用性質。

不過他在試用期間工作很好，以致一九四四年迅速繼任國務院的東歐事務司的副司長，以後便升到司長。

一九四六年，任命他爲駐莫斯科大使館顧問。

在大使館工作的美國人了解得很清楚，直到最近仍是杜爾布勞而非大使在指揮大使館，並且是杜爾布勞在實際決定人事問題，起草發往國務院去的最重要的電報等。

長期工作的國務院職員也了解杜爾布勞會終生在國務院任職，並且在長期內，他必然將仍爲一支應該算計的力量，他們也了解大使終有一天會離開國務院的。所以，無怪他們對於杜爾布勞要比對大使更爲注意。

自從杜爾布勞到莫斯科以後，他會盡力在俄羅斯人和大使館的美國人中間建立並保持一個「鐵幕」，他所以這樣做第一是因爲他生活在對俄羅斯影響的鄙陋恐懼中，而且恐懼那些影響可能感化他的僚屬。

第二，如他能使他的國人孤立於圍繞着他們的社會之範圍愈大，則愈便於使他爲他的反蘇目的而贏得他們的輕信，祇有在完全孤立於他周圍的俄羅斯人的氛圍下，杜爾布勞才能夠執行他的「仇視蘇聯」的計劃，而不遭受在大使館內發展內部矛盾的危險。

而必需講清的是儘管國務院很小心地在對國務院的路線之絕對忠誠的基礎上去選擇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國人，儘管這些美國人經常地在大館使和國務院內受過宣傳與教導，但是有些思想開明，心地忠厚的人却脫出了「忠誠檢查」。這些人如果他們本身認識了蘇聯人民及其態度與目標，他們就絕不會接受杜爾布勞的曲解，也絕不會幫助他執行「仇視蘇聯」的路線。

所以杜爾布勞，有了大使與國務院的充分支持，就力圖用直接與間接的壓力去阻止其僚屬與蘇聯人的長期接觸的發展。

在某些場合，當大使館官員知道某些人保持了這種長期接觸時，他們就被傳見，並告訴他們將這種關係切斷，否則就要選擇另外一條道路，被丟臉地遣送回國。在其他的場合，這樣的人祇

是單純被調動工作崗位，或在虛偽藉口下被遣送回美國。

杜爾布勞一生中從來沒有光明正大地做過他能用陰險的方式處理的事情，偶爾他也等到違背了他的命令的僚屬們因休假或是因其他的原因離開蘇聯時，才在他們不在時安排他們的調動，以阻止他們再回來。

我深信我的同屋西靈亞，華斯到柏林去治病沒有回到莫斯科來這件事就不是一種偶合。

當然，杜爾布勞在他禁止美國人與蘇聯公民長期接觸的禁令中，對於許多從事於收集特務情報的美國諜報人員是有顯而易見的例外的。這些人員中不但有許多是在大使館服務的陸軍與海軍工作人員，而且也有在那裏受僱用的非戰鬥人員，他們不懂得到發展這樣接觸的許可，而且接受積極的命令這樣做，並將這種接觸全部報告大使館。

杜爾布勞控制大使館工作人員的主要支柱是一組個人的系統，這些個人經常向他報告其他美國人的活動，他們的政見，他們的個人生活，他們的友誼，這些個人特別注意傾向於表示與在嚴格意義上的大使館和國務院政策有分歧的任何人。人家告我說大使也是這「告密者」系統的虔誠信徒。

幾位大使館官員與職員的妻子在這系統中是特別有用處的。約翰·戴維斯太太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她故意鼓勵大使館職員中的一些女孩子向她「坦白」，於是系統地將她們的反應和她們由大使館其他人處所搜集來的閒話報告給她的丈夫和杜爾布勞。

應該附帶說說的是：按照大使館一般的意見，羅伯特·馬其梁夫在這方面也是有用的。他做

爲一個「獨立」的局外人，常常表示多少有利於蘇聯的看法，從而搜集，並報告那些信任他的一些「異教徒」的態度。

當他在莫斯科逗留期間，杜爾布勞成功地替他自己免除了所有在使節團中因某種原故爲他所嫌惡的人。有時他利用收到的囚人報告對他所不喜歡的人們的「忠實」表示懷疑。此外，他還用更加露骨的方法。

有一次在大使館有一個警衛員，工作很努力，他經常在工作時間以後巡視所有的辦公室。他發現有兩次當辦公室沒人把守時，杜爾布勞的保險櫃都在開着沒關，他兩次都說與報告這種嚴重的違反安全的事件給國務院。從那以後不久，這個警衛員離開蘇聯去旅行，當他仍在外面時，就出乎意料地被調到其他工作崗位去了。

杜爾布勞正像國務院蘇聯事務藝術集團的其他人一樣，他是很努力於曲解並歪曲關於蘇聯情報。事實上，杜爾布勞祇報告適合於他的政策的情報——即誇誇蘇聯的情報。雖然，照我所了解的情況與印象，杜爾布勞在這方面的工作方法是十分膚淺的，他找到一批現成的讀者，這些在華盛頓接到並讀到他的電報與報告的人已十分心甘情願地相信他贈給他們的任何說話。他愛這一「工作」並且無論何時祇要他得到一條新的反蘇流言，或能用反蘇的精神加以歪曲的一些事實，都使他像小孩子獲得一件新玩具一樣高興。

這位蘇聯問題的「專家」他除去足以爲他的廚師解釋午飯要吃些什麼以外甚至於不聽蘇聯語文，並且他幾乎毫不了解蘇聯，但竟能在華盛頓找到閱讀如此「情報」的一群現成讀者，這一方

面要稱頌在那邊的讀者之易於受騙，另一方面也顯示由於反蘇情緒壓倒客觀現實所引起的幻想到何種程度。

當新職員由美國來到大使館時，杜爾布勞——如我自身體驗使我確信的——開始用反蘇精神熱心地訓練他們，並且依據新人所表現的反蘇見解的程度而或多或少地繼續着這一工作。

從與思想進步的大使館職員的談話中，我得到以下這種印象：在他們中有些人也許是天真地認為如果大使館另有一位實際負責大使館政治工作的顧問，那麼整個的氣氛就會兩樣了。

由我在國務院所見所聞關於前任大使館顧問凱南的種種，我確信杜爾布勞是他的合適的繼承者。

杜爾布勞全然與凱南一樣，用同樣的方式方法，鼓動美國與蘇聯中間的惡感。

由我親身經驗，以及別人的經驗，使我曉得所有由大使館發出送到國務院的一切主要文件都是由杜爾布勞親自編輯，大使館的職員非常熟悉於他的政治的與文藝的風格，並且知道如果他們的報告，不包括兩三處反蘇誹謗，如果他們不是在形式上與內容上完全針對反蘇的話，杜爾布勞將不會讓這些文件送抵國務院。

大使館的職員爲了關心保持他們的地位，並取得杜爾布勞的寵愛，以最後取得國務院統治集團的垂青，他們就用特殊的文體去寫他們的報告。儘管如此，杜爾布勞還要主動地幾乎在每件有關蘇聯生活的文件上附加反蘇的註解。

由大使館職員，軍事代表，訪員及其他一些人那裏搜集來的反蘇情報也是用同樣的方式去處

理，並且祇有杜爾布勞表示同意以後，才交大使簽署，發往華盛頓。

杜爾布勞，像他的許多同僚一樣，對美國政府系統毫無敬意，並時常甚至於當着他自己的職員面前也用諷諷的語句表示他自己對國會與美國總統的不滿。

他正像和他一起在國務院服務的所有蘇聯事務的壟斷家一樣，寧願看到目前的美國政府爲一種權力主義的反共政權所代替，那就可能使他的集團執行華爾街所教唆的政策而不會遇到任何阻撓。

不過，一般說來，杜爾布勞是沒有獨立的政治信念的；他祇有情緒的反應。他仇視蘇聯，並且一察一笑都是爲這主要的和極其重要的事實所決定。

萊因哈特是駐莫斯科美國大使館的一等秘書。身材高大，膚色黧黑，並且有些淫蕩似的漂亮。萊因哈特是大多數美國人心目中的外交人員，他祇缺少傳統上外交家帶的單片眼鏡。他毫無拘束地參加別人主持的『外交』茶會，外交歡迎會和鷄尾酒會，他永遠知道從升官的觀點出發，他應該對誰表示友善，他也永遠知道如何做最好。

萊因哈特是一個喜歡和女人們打交道的男子並精通此道，取悅於有勢力的老太太和同二十歲的少女吊膀子對於他是同樣優遊暇裕的事。

他的資本就是他的性感，而且他已發現了在美國外交界成功的關鍵，或者至少其關鍵之一，就是影響與他升官有必要關係的那些人物的太太們的詭計。

萊因哈特是一個『無國籍界限』的美國人的最好典型。他大部分學業是在西歐攻讀的，甚至

於小學也是在那裏。他能操流利的法語、德語、義大利與俄語。可以說他對美國一無所知，也許是關心更少。他並沒有在美國住多久，每年到瑞士消磨假期。

如果說萊因哈特對「粗野的」美國人關心很少的話，那麼，他對「有修養的」德國人却非常關心。他像喬治·凱南一樣是親德派。當戰前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時，他正在莫斯科，儘管事實是正值大戰爆發前夜，儘管美國政府對希特勒時常表示敵意，但在駐莫斯科德國大使館內仍有萊因哈特最好的朋友們。他是他們的酒友，而且如果實話實說，他也許就是供給那些諜報人員以美國對德與對蘇政策的珍貴的諜報來源。

正是鑒於萊因哈特的這些自然的同情心，我們才可以判斷以下這一事實的意義：即萊因哈特正如凱南被認為不但是國務院對蘇的，而且也是對德的重要「專家」之一。

不過，在萊因哈特性格中的主要原動力則既非對德的同情，也非恐俄病——不論這些對他是何等重要。

萊因哈特至要關心他自己的事業。他純粹是一個投機份子，老在追尋升官晉級，不管用什麼代價，不管他得如何卑躬屈節才能達到。

駐莫斯科美國大使館的人都知道當萊因哈特在戰前在這裏時會和一個芬蘭血統的美國女子戀愛得很熱火，大家也知道這戀愛事件的結果是一個生下來不久就死去的小孩。

儘管萊因哈特無疑地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愛這女孩子，但他並沒和她結婚，因為他認為從她既無財產又無社會地位這點看來，這個婚姻就會「坑」了他的事業，和一個連至沒有財產和地位的

美國女人結婚如何會阻礙萊因哈特的升官這件事是不很明白的。他想將會阻礙他升官這一事實可以使我们看到他對於關乎他自己專業的問題的一般聰明程度。

萊因哈特從一九三七年開始他在國務院外交服務的生涯。早已在一九三九年，當他被派到塔林的美公使館去時，他已處在美蘇關係領域的邊緣。一九四〇年他被派到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在那裏他做一個三等秘書直到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他被安插到勞埃，亨德遜的對蘇事務司裏。應該斷定，與亨德遜博覽一接觸就足以保證了他馬上為國務院「對蘇事務斷集團」中的反蘇官員小團體所接受。

亨德遜那時是處在極端困難的局面下。如我在別處所寫的，在一九四一年他公開地預言了德國會贏得對蘇戰爭，並在整個國務院內廣泛地宣傳了這一看法。

到一九四二年，亨德遜就因為這一預言，成為國務院的笑柄，且更有甚者，白宮那裏也知道亨德遜企圖在這緊要關頭妨害美蘇關係。所以羅斯福會準備將他撤離蘇美事務。

亨德遜感覺到了這點，他就切望加強「對蘇專家們」集團的地位，即使祇是加強國務院內他自己這羣人的地位，那麼他即使臨時「放逐」，他也仍能如先那樣活動，萊因哈特絕妙地恰能滿足這一目的。他在華盛頓，在司裏工作，他沒有使自已受到其他蘇聯問題「專家」所受到的那樣的妨礙。要將反蘇政策推行到底，他是可期待的一個。

他被引進反蘇集團裏，並且從那以後成為蘇美問題的先驅人物之一，自然較次於凱南，鮑梭，或杜爾布勞，但是無論怎樣，他是在這方面註定有重大前途的人。

如果假定甚至在這蘇聯問題「專家」的小團體中，大家都是很和諧的話，那麼就會是一個錯誤。萊因哈特嫌惡杜爾布勞，如衆所週知，他毫不猶疑地在大使館裏與他最密切的相識的私人談話中作如此表示。

我們有任何理由懷疑萊因哈特的感情會受到杜爾布勞的報復。不過當面他們是最好的朋友。總之，他們關於美國對蘇政策是基本完全一致的。

萊因哈特差不多和杜爾布勞一樣地仇視蘇聯。他會無疑地想用原子彈使蘇聯絕跡於地球上，而關於這點他是毫不遲疑地在大使館中表白得清清楚楚的。他對於有關蘇聯的任何事情均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怖。

迄今爲止，萊因哈特一直在指導新聞組的事務，它是從事於將在蘇聯報紙上逐日發表的消息都報告給華盛頓的。

在這地位上，萊因哈特指派了一個外交人員叫大衛·亨利，據說是他的一個親戚，去任新聞組的組長，萊因哈特以如此一種方式來管理這工作，即集中最高度的注意力在能將蘇聯政策與政治生活歪曲至極大限度的發展上。他的報告經常企圖在國務院內支持大使館的反蘇政策，並且對華盛頓的國務院。隱避與這些政策相矛盾的事實和發展。他的職位自然是大使館裏的一個重要職位。

萊因哈特更進一步被指派與外國外交人員締結關係的任務，爲了從他們那裏可以吸取能用來誹謗蘇聯的情報。他是在莫斯科最熱中的閒話與謠言的搜集者之一，並且立即將此類與其報告計

劃相合的閒話與謠言報告給國務院。他這樣在「外交」工作的範圍內孜孜不倦地締交能力甚受重視。

在大使館，人們認為萊因哈特也受命在蘇聯公民中做間諜工作，這事是非常可信的。據認為他與美國的軍事的與非戰鬥人員的諜報組織都有很密切的關係，並且這些組織給過他種種需要有高級外交職位並俄語知識的指定工作。再說下面一件事就夠了，萊因哈特——雖然他竭力使這事不為大使館其他工作人員所知——是熱望尋求與某些蘇聯公民接觸的。

他也與大使館的領事組有密切接觸，在那組的諜報人員企圖從申請入美國籍的人們口中得到情報。

萊因哈特最近被任命為列寧格勒的美國領事。這一崗位在大使館內部常常被視為有諜報工作的首要意義的。不過萊因哈特沒有去列寧格勒，因為他太懶於佈置一切。惟則大使館虛假地報告國務院說蘇聯當局造成在列寧格勒成立領事館的「種種困難」，但其真象是為大使館內的人們所週知的。

旬然，實際上是很明顯的，可以先在臨時的^{地方}開始工作，甚至於如果必要，可等上一月左右造好預備居住的永久性建築。但這會是不合乎萊因哈特的口味的，所以他不做這種事。

萊因哈特被派住到大使的個人住宅斯巴索大廈去，並親自幫助大使管理這大廈，招待客人和其他的「工作」。萊因哈特深恨這一措施，並且也完全不喜歡大使這個人，這事在最近幾次宴會上爆發以後，就變為大使館的一般談話資料了。

所以值得把萊因哈特寫得這麼詳細的原故乃是因為他是國務院反蘇集團中的重要年青人之一。他年方三十，在面前尚有一長段擁護反蘇政策的歷程——在他可能派去的種種工作崗位上，也許是莫斯科，也許是華盛頓，和世界上其他的地方。

他幾乎確信他終將在國務院中佔據要津。他的願使自己猛進的非常能力差不多保證了他將來的地位。

像萊因哈特這種人，步武亨德遜、凱南、和杜爾布勞，而且在同時又忙於訓練小亨德遜、凱南、杜爾布勞、與萊因哈特使在將來從事美蘇關係的工作，像他這種人的穩定的地位就清楚地表明了下面這事實：國務院已將它本身的命運交給那些以他們繼續敗壞美蘇關係的能力去把一切做爲賭注的人們。

如果在美國國內沒有一個根本的政治變化，——這變化同時可清掃一下國務院——要改進美蘇關係祇是徒然妄想。

像萊因哈特的這班人知道一旦美蘇重新友好，他們的事業就會走向悲慘的結局。所以他們將盡其全力阻礙兩國間顯著困難問題的解決並且判定美蘇人民永遠仇視——直到當美國人民決定把這些「外交人員」從重要職位上踢開並代以將國家利害放在自己自私的事業之上的客觀態度的人們這一代爲止。

我祇描寫了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極少幾個領頭的工作人員的嘴臉，而未細述其他人。但因爲大使館的重要職位常爲華盛頓的國務院反蘇集團的代表們所把持，所以在其他篇章中我將再詳爲

論及。

這樣，美國的公共輿論與美國人民幾乎完全依靠這一小群反動集團，其中包括大使館官員與反動的新聞記者，他們壟斷了一切有關蘇聯情報的途徑，並對美蘇人民的利益造成極大的損害。

第四章 美國大使館的諜報活動

如我在上面所提到的，駐莫斯科美國大使館佈置它的工作以便得到關於蘇聯的偏頗的情報。當然這工作並非在莫斯科計劃的。我知道有好幾回，大使館密碼電報，指示他們收集能供美國報紙與無線電廣播的實際反蘇宣傳運動之用的有傾向的與偏頗的情報。這些電信指示是由國務卿或其代理副國務卿簽署的。

國務院及覆敦促大使館加緊蒐集那些可以用來反對蘇聯及其日益增長的國際影響的情報，俾通過美國新聞處在美國和其他國家之內進行宣傳。

這些指示是犬儒的，無恥的。國務院的領袖們特別強調有關聯人民生活水準的事實和材料，他們建議爲了反蘇宣傳應將這些事實和材料加以竄改與曲解。

有時我覺得我好像是在什麼諜報機關裏工作。甚至在拿我會服務過的美國新聞處作例子吧。它從過去幾年以至現在，差不多完全羅致了一些職業的諜報官員，他們不能，或者寧可說是不願有捨棄他們諜報習慣的最低願望。

我所指的是這些職業的諜報人員，如以前海軍諜報處的威里斯，和威廉姆斯，前美國新聞處長梅威爾、羅格斯、及約瑟夫·漢森等，他們都是戰畧服務處的正式職員。

我看到大使館職員在大使館與國務院的命令下，如何去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得到關於蘇聯人民生活水準與士氣的偏頗情報，得到蘇聯的工業及農業材料，等等。

比如，當大使館職員們因公或遊覽要到蘇聯各地作短期旅行時，在他們回到大使館後應寫出關於他們旅途中的所見所聞，他們與所遇見的蘇聯人民的一切談話，與由這些談話中所蒐集的情報等等的詳盡報告，指令他們要着重寫那些可以用於反蘇宣傳目的的不利於蘇聯的甚至極其瑣屑零星的情報。

我個人知道許多實例，如大使館一些職員誇大他們在旅行中所注意到的某些缺點，或者，在其他場合，他們甚至捏造一些對蘇聯生活某些狀況加以歪曲誹謗的插話。

所有這些實例的原因是：在一個大使館職員的報告或備忘錄中的反蘇誹謗愈多，則那一職員便愈受重視。

在戰時，大使館職員常藉口與美國在敦德薩，別洛露西亞，與烏克蘭的聯總代表保持聯繫，或以到摩爾曼斯克，亞爾干日爾，海參威去的名義從事於旅行全蘇。戰後，他們的最終目的地多半是海參威，有一個美國總領事駐在那裏。所有這些各式各樣的旅行曾經是，而且現在也還是用以搜集有意的諜報。

我能引證許多實例。但兩個例子就足夠證明這點了。

一個以前美海軍情報處的少校，路易士，路克，她是美國領事館的參贊，有一次到海參威去旅行。據說她是去取外交郵件的。實際上，她是在大使館當局命令之下，利用這次短期旅行搜集諜報材料的。

她受命在途中結識一些人，並將她在西伯利亞鐵路上所見的軍事設備紀錄下來。她並受命取

得在西伯利亞及蘇維埃遠東地區的生活水平的竄改過的情報，裨用在美國的反蘇宣傳上。

當路易士，路克回到莫斯科時，她寫了一篇關於她在旅途中所見所聞的詳細報告。她寫了她在旅途中所遇見的一切人們，與他們的談話，以及許多其他的細節，甚至於包括她所乘火車一路停留的一切大站上的食物價格。所有這些『廣泛』的諜報都是用最富於誹謗的語句寫就的。恰如我所發現的，路克爲了要使她的報告更動人聽聞，更有趣味，她在報告裏敘述的某些插話是捏造的。

路克自己也承認她捏造了許多事實，因爲在她由莫斯科旅行到海參威期間，她遇見了幾位有趣的人物，和他們一起她花費了全部時間去娛樂自己——飲酒打紙牌。事實上，她就沒有看見過任何一件可以值得一提的事。

我還可以提提一個大使館的三等秘書，佛里爾斯，他也以同樣辦法使自己出名，佛里爾斯最近到烏拉爾，中亞細亞，與高加索做一次同樣的旅行。在旅途中，他也認識許多人，並且盡力從他們那裏得到情報，然後把它用最添枝生葉的方式寫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上面。

這些美國『外交人員』不僅搜集（在整理以後）能用爲反蘇運動的一般諜報。他們也企圖得盡可能多的純粹軍事性質的情報。

比如，佛里爾斯小心地計算並寫下他一路上經過的所有飛機場的名字，並注意在那上面飛機的數字。他試圖確定在他旅途中的軍隊的地點與力量，以及其他純粹軍事性質的材料。換言之，佛里爾斯從事於直接意義的軍事間諜工作。

駐莫斯科美大使館爲了便於收集諜報，分爲幾組，即經濟，政治，新聞，農業，領事，與其他一些爲了特殊組別的服務與職員的需要而必需添設的技術性的與行政方面的組。

這些組的名稱證明了他們諜報工作的方向。比如，經濟組收集關於蘇聯工業，生產品的數量 and 質量的情報；它保存有關蘇聯經濟的卡片索引，那裏面排列的是由大使館職員，從蘇聯報紙上搜集來的情報。農業組的工作也是同樣進行的。它收集蘇聯過去秋收與將來秋收預測的情報。

領事組的客人常常是一些沒有公民權的人或者現在居住在蘇聯的前美國公民。他們帶了種種問題來到這裏，有些希望找到在美國親戚的任處以便恢復通信；其他一些人多半是老年人，要知道與其在美國的子女團圓的可能條件是什麼。領事組的職員多半是諜報人員，他們招從這些客人口中挖出關於蘇聯的情報當做他們的業務。

當這樣的客人在其請求得到處理之前，他先要受到領事組諜報老手們的機巧審問。他們窺探軍隊地點的諜報，生活水平與狀況的情報，特別注意由其他一些城市來的客人窺探這些材料，和其他有諜報價值的任何東西。請求者自己已在不注意中就變爲美國人中的一個報告者。

領事組官員敢作敢爲。請求者是否能使其請求得到處理就要靠他對他們的盤問之坦白情況如何。他們常在注意疏忽、質撲類型的人，並聰明地使他上套。他們會就擱着處理他的事情，使他多去領事組幾趟，於是給他指定間諜工作，並堅持要他們完成。

我是了解這類情況的，並且這使老年男女從事於反蘇間諜工作的殘忍誘騙常常喚起我深刻的義憤。

領事組的諜報官員並不爲下一事實所嚇住：即他們拖他們的客人去做間諜活動，就有使他們（客人）被蘇聯當局檢舉的嚴重危險。

他們祇關心一件事——就是收集一切他們能得到的諜報，而不顧勢必連累他們報告者的難免的危險。

就是這種對這些人的犬儒態度最激起我的憤怒，但是我在大使館裏所處的地位，不足以制止這些美國諜報人員的殘忍的行動。

在大使館職員中的朋友們告訴我：這些假冒外交人員的美國諜報官員寧願自己不親手去做間諜工作而拖累到大使館來的客人去做，因爲在蘇聯做間諜工作非常困難，並且包含着極大的冒險。

募集蘇聯公民做間諜之困難是美國諜報人員常有的怨言。這常使他們碰到沒趣的事，並且結果有時搞得被迫趕快從蘇聯引退。

因此，美國情報人員爲了渴望贏得他們華盛頓的頭子們的寵愛，——這些頭子堅持對蘇諜報活動應該加強——就力求在蘇聯社會裏面由那些承擔了奴隸式崇拜「西方文化」傳統的落後分子和渣滓中去招募其代理人。

當任何一個爲美國做間諜的這些渣滓一旦落到蘇聯保衛機關手裏時，美國諜報人員就在他們自己大使館裏和其他駐莫斯科使節團裏散佈謠言說在蘇聯，「無辜人民」遭到了逮捕。

難道還有比這個更厲害的「犬儒主義」麼！

當職業諜報活動者史密斯中將到莫斯科來做大使時，他不喜歡許多爲哈里曼；對於他說，諜報活動寧屬副業而非職業，——所留下的工作方法。史密斯認爲大使館的諜報活動是太過於低級與天真了，他隨即澈底予以改組。

史密斯使每一職員，下至最低的辦事員，不管他屬於那一組，都要從事於諜報活動。史密斯把與蘇聯公民建立簡短的接觸關係，和他們談蘇聯生活各方面的情況，並將職員自己採集的一切重要的與不重要的情報備爲冗長詳盡的備忘錄這些事做爲一切大使館職員的職責。爲了這一目的，甚至於連禁止與蘇聯公民交往的不宣佈的規則也多少有些鬆弛了。

史密斯大使和杜爾布勞顧問兩人經常在他們與大使館職員談話中着重說在諜報工作裏，沒有所謂無價值或者不重要的情報；每件能採集來的關於蘇聯經濟與蘇聯生活任何方面的細節都是有價值的。

美國大使館的官員們追隨了史密斯與杜爾布勞的指示，在莫斯科及其周圍遊蕩，試圖發現軍事目標的地點。如果他們在這方面失敗了，他們就到市場，店舖，食堂，酒店與火車站去探尋，採集閒話與謠言，然後把這些加工成爲反蘇形式並冒充爲由特務所得的諜報。它是以此種形式送交華盛頓的。

杜爾布勞顧問有時甚至於堅持要大使館職員把他們會由城中蘇聯朋友處聽來的逸聞趣話記下，並以備忘錄的形式寫出來。

大使館職員之一，瑪露·海勒爾的特務業務就文總結由高級與初級職員中接受來的備忘錄的

工作。她也保存有一批由大使館職員收集來的蘇聯工業，農業與運輸的諜報檔案。

我知道許多實例，當大使館職員爲要贏得他們上級的歡心，常捏造『事實』誹謗蘇聯。把捏造『事實』加工成爲備忘錄，並且假裝着他們是由與蘇聯公民交談時知道的。

所有這些都總結一起並收入檔案中。當大使館職員寫他們的報告時可以自由取出檔案參考。人們可以想像根據用這種辦法收集來的閒話與瑣碎材料的情報會給蘇聯現實情況以多麼偏頗有惡意的圖畫。

在大使館也有進步思想的職員，抗拒拉他們做諜報工作的企圖。

杜爾布勞再三示意我，叫我寫諜報備忘錄，講出我的知識，我和他們的談話，等等。

我在敖德薩度過假期，當我回來以後，杜爾布勞請我將我在那邊所見所聞寫一個詳細報告。我正如前此一樣地拒絕了，並告他我休假是自己的私事，我認爲沒有理由將我如何休假寫報告。

有些大使館職員對這種工作是很熱心的。比如，前新聞局代理局長，伊麗莎白，伊什就是一個。她得到大使館的許可，主動地東奔西跑與蘇聯公民開始接觸。所有她與他們的談話，關於每一可想像得到的題目，她都細微詳盡地以諜報備忘錄的形式寫出來提交大使館負責人。這樣使她與他們甚爲相得。

在伊麗莎白，伊什回到美國以後，她偶然爲美國反動期刊起始寫些誹謗蘇聯人民的的文章。她在『王冠』雜誌寫了一篇帶有『桃色的』標題的長篇小說——『我認識的伊國男人』。這篇單純是對蘇聯生活與蘇聯人民的惡意諷刺文字。她訴說她假想的與蘇聯男人們的各種戀愛，並在與他

們的戀愛過程中所聽到的『事實』——一切都是純然的幻想。

伊甘在誹謗蘇聯男子的同時，還對英勇的蘇聯婦女投以譏諷的嘲弄。當殘忍與嚴肅的戰爭年代中，當莫斯科與斯大林格勒的偉大女性正是她們丈夫，兒子與未婚夫在前線戰鬥之如此忠實的戰友，她們不僅在工廠與農場上代替了他們，而且她們中許多人積極參與了紅軍的軍事行動時，伊甘却嘲笑在這時期裏莫斯科與斯大林格勒偉大女性的服裝樣式。一個人用這麼一種嘲笑的方式去講偉大的蘇聯婦女，她一定是道德上敗壞並退化了。

再回來說說美國外交使節團裏職員的諜報活動。在蘇聯的美國特務活動曾經受過一系列的嚴重挫折。在美國情報機關中有過許多間諜被捕的事，最近，還有幾個利用外交護照或報紙通訊員工作證為掩護來活動的職業特務被蘇聯驅逐出境的例子。但是，必須着重說說的是在蘇聯的美國特務活動仍是並未減輕地在繼續着。

美國的反動頭子們，通過他們在國務院和武裝部隊中的代理人，對他們在莫斯科的諜報代表增加其壓力，使加劇他們的間諜活動。一些受牽連和被驅逐的諜報官員換以另外的一批人。間諜工作繼續進行。

美國大使館和軍事參贊處的職業諜報員的方法可以最近幾次不名譽的暴露事件來說明。

喬治·羅拉德，一個以助理海軍參贊的職位在蘇聯工作的美國諜報官員，是很活躍地作着間諜工作。

二次大戰的頭幾年，羅拉德為美國海軍使團團長在亞爾干日爾工作。他的正式職務是幫助蘇

聯當局接收從美國運來的租借物資。但這只是他的副業。他在亞爾十日爾的主要目的是獲得秘密的軍事情報。

羅拉德到了亞爾十日爾即很熱心地努力去執行從 ONI 發來的訓令。

一九四三年羅拉德被派任一獨立職位，是海參威美國總領事館的助理海軍參贊。對羅拉德說，這個職位是一種提升。因為蘇聯遠東是美國諜報機關極感興趣的，特別是鑒于太平洋戰場的重要性。

羅拉德與愛琳·瑪秋雪斯一同得到派往海參威的任命，愛琳在亞爾十日爾就擔任羅拉德的翻譯。羅拉德有重要的理由堅決主張將瑪秋雪斯調去海參威，因為他已把她捲入間諜工作中而她對於他已是不可缺少的了。

假如羅拉德在亞爾十日爾時，爲了進行工作而採用審慎而小心的辦法，並使他自己去適應蘇聯情況，那麼這次在海參威就不是如此了。已經得到了某些經驗，他試欲大規模地發展他的間諜活動，如在亞爾十日爾一樣，瑪秋雪斯（他給她在美領事館找到翻譯的職位），積極幫助他的這一工作。

瑪秋雪斯奉羅拉德的命令，在紅軍的軍事人員港務工作者，蘇聯船隻的船長等人中間建立了關係。她探索出對羅拉德有興趣的人並介紹他們相識。

羅拉德經常爲莫斯科美國海軍使團的職員們稱爲有才能的諜報官員，他假裝對蘇聯友善以博得他所認識的蘇聯公民對他有好印象，在與他們喝酒時偶然談話中探索秘密情報。

羅拉德把缺少經驗的人們捲入間諜陰謀網，有時是成功的。

爲了達成他的目的，羅拉德毫不猶豫地採取勒索敲詐與威嚇手段對付他所認識的人，當這些人知道了他是個特務不願被他當間諜利用時他就這樣做。

我得悉羅拉德在海參威的工作得到大使館首腦們的讚揚。

我已經指出過，愛琳·瑪秋雪斯是他間諜工作中最信任的助手，瑪秋雪斯與他的上司一樣，是經常與蘇聯公民交往的，在他們之中結交私人「朋友」，大方地請他們吃東西並送他們小小的禮物。

在海參威從事積極的間諜活動之後，瑪秋雪斯發現蘇聯保衛機關在注意她。這種監視使她不安，同時知道也許會被捕，她便開始設法到美國去。

但已經太晚了。一九四七年蘇聯保衛機關拘捕了瑪秋雪斯並清除了羅拉德在海參威建立起來的間諜巢穴。

這一事件引起了莫斯科大使館方面空前的驚慌，特別是海軍使團，因爲那裡的美國人很怕大使館的間諜活動暴露了。

然而，美國海軍諜報處在蘇聯工作的嚴重失敗並沒有中止大使館及海軍組諜報官員們繼續他們的不正當活動。

另一個美國諜報機關在蘇聯的「明星」是海軍諜報處的一個職業諜報人員，助理海軍參贊，羅伯特·德萊赫，他在一九四六——四七年在教得薩美國海軍使團工作時運用了他的才能。

德萊赫訴苦在激得薩間諜工作難于進行，因為蘇聯當局密切注視他，不允許他順利組織他的間諜工作。

德萊赫的特別功績是獲得一個間諜，這個人是激得薩海關的一個官員，因為工作關係，與美國代表們有官方的來往。

從我的大使館朋友們那裡，我聽到德萊赫是當場被捕的，我知道這一事件牽涉到德萊赫在激得薩招募來的那個間諜，他是到莫斯科去給他送諜報消息的。

蘇聯讀者已經知道美國記者羅伯特·瑪吉道夫，以間諜罪而被逐出蘇聯的。這裏我只想將我所知道的關於瑪吉道夫的活動指出，因為他是大使館的經常「來客」而且是此地所有的美國人都熟知的。

羅伯特·瑪吉道夫會多年居住蘇聯。他是非常熟悉這個國家和俄國語言的。他與俄羅斯人結婚因而這裏也有些家庭關係。

瑪吉道夫在美國大使館中是被視為消息靈通人士的。他是有用的而且被那裏的人們所賞識的，因為他有系統地供給關於蘇聯的情報。

大使館的人們稱他為幹練的人，他能夠到處去鑽，由于他常常努力對他的蘇聯朋友們造成一種印象，即他對蘇聯是忠實而友好的，以取得情報。

事實上他從來都不是蘇聯的朋友，他爲了與蘇聯公民做朋友以從他們獲得種種諜報消息，而掩蓋他的見解。

我認爲在麥克格勞——希爾出版公司掩護下的美國諜報官員是有意地挑選瑪吉道夫，要他收集關於蘇聯的諜報消息，美國諜報機關很知道瑪吉道夫對蘇聯情況很熟悉，同時又有間諜經驗。

瑪吉道夫盡力去執行美國諜報機關的命令。他經常在市內各處閒蕩，企圖鑽入蘇聯的科學機關，去結識正從事新的科學研究的蘇聯科學家。瑪吉道夫收集了並甚至把他所發現的最瑣細的情節都報告給大使館。

瑪吉道夫和各諜報機關的連絡，照例是通過大使館的外交袋。記得有好幾次我在大使館當值日官的時候，看到瑪吉道夫將他的函件送到袋室去發往美國。大使館用這種方法鼓勵和幫助瑪吉道夫的間諜工作，而這樣做是犯了嚴重的違犯外交郵政特權的罪。

當我知道蘇聯當局決定要結束這種無恥情形時，我毫不驚異。

第五章 美國新聞處和美國宣傳

除了戰畧服務處外，一九四二年六月又建立了戰事新聞處，雖然二者密切相關，但戰畧服務處和戰事新聞處的作用却是不同的。

形式上戰事新聞處是一個宣傳機關，但實際上它却是做諜報工作的。

戰事新聞處在戰爭期間公開任務就是在美國，同盟國，中立國和敵國的領土上散佈宣傳，情報和歪曲的情報。

新聞記者兼廣播評論員埃馬·戴維斯被委任為戰事新聞處的處長。

一個特別委員會為戰事新聞處建立了起來，包括陸軍部、國務院、海軍部和其他部院的代表。

戰事新聞處利用其在同盟國和中立國的公開分處和新聞代表推廣其諜報和宣傳活動。

除了在美國和國外的諜報和宣傳工作之外，戰事新聞處在美國也担任檢查的工作，為美國政府充任類似官方新聞局的工作，通過它發佈正式的公報和聲明。

在國外所有美國大使館中都附設有戰事新聞處的分處。莫斯科的美大使館也成立一個分處，它的職員在發佈美國出版物和影片的偽裝下會積極從事諜報工作，他們藉口文化和宣傳工作，和蘇聯人交朋友，企圖從他們那裏搜集對美國諜報組織有利的情報。

戰爭結束之後，戰事新聞處及一部分戰畧服務處都併入國務院，成立了國際新聞和文化事業處。爲了符合這一改組，附設於大使館的戰事新聞處分處也有一定程度上的改變。大使館設立了一個新聞局，隸屬於國務院的國務新聞和文化事業處。

我最熟悉莫斯科美國大使館中通稱爲美國新聞處的那一部分。這一組織公開從事在蘇聯散佈美國宣傳的工作。它在莫斯科維斯寧街有一所辦公處，其活動受美國大使館的領導。

我在美國新聞處中工作了將近兩年半。在這一期間，我和行政及其他負責工作都有關，自然對這一組織的工作的每個方面及其計劃都非常熟悉。

在蘇聯的美國官方宣傳有兩個主要的媒介了：俄語雜誌『美國』和『美國之音』的俄語廣播節目。

這兩種媒介的宣傳材料主要是由華盛頓和紐約的一個龐大的組織準備的。該組織僱用了許多白俄。

『美國之音』不僅將白黨份子用做廣播員，而且用做俄國問題專家和無線電廣播的顧問，不難臆測『美國之音』從這些擅於對蘇聯人民進行有系統的污蔑挑撥的『專家』那裏得到一些什麼樣的建議。『美國之音』不了解，由於它每天將白黨顧問的可惡捏造沾污以太，使自己處在怎樣尷尬的地位上。

值得注意的是，不僅國務院中與『美國之音』廣播有關的一部分任用這些萬惡的挑撥者；而且國務院中反蘇集團的領導人物亦與美國的俄羅斯白黨組織保持密切的聯系。

一九四七年、美國的俄國法西斯罪魁，馮西阿茲基，沒有期滿就從監獄中釋放了出來，這件事確實是富於徵候的。他在一九四二年由於替德日利益從事反蘇的間諜活動而由聯邦法院判處長期徒刑。

國務院反蘇集團的首腦之一，弗蘭西斯·斯蒂文斯就娶了一個白俄僑民做老婆。盡人皆知斯蒂文斯夫人鼎力協助另一個白俄僑民——克西尼亞·邊尼斯——到國務院來。國務院立即派她和她的丈夫一起到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去工作。

克西妮亞·巴尼斯在大使館工作時也正是我在那裏工作的時候。實際上，她是美國白俄集團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的代表。她的態度是極端反蘇的，她不僅大大地左右了自己的丈夫——大使館經濟處處長，而且還很有効地執行了國務院關於向大使館其他職員進行反蘇教育的命令。

克西妮亞·巴尼斯在莫斯科的時候，她告訴我她的母親住在紐約附近里得農場上和前托爾斯泰伯爵夫人在一起。克西妮亞也和前托爾斯泰伯爵夫人過從很密。而個人都積極地從事着反蘇挑釁。克西妮亞·巴尼斯的過去生活是不無辛酸的。她是敦德塞一家酒店的歌女，內戰的時候逃到了國外。

誰也不能否認，美國國務院對於選擇什麼樣的人來做「蘇聯專家」這一點到是十分「開明」的。我們同時看到一個前伯爵夫人——她已經沾污了她的偉大父親的姓名——和一個敦德塞酒店的歌女。

美國政府所豢養的這些俄國白黨份子，除了充任美國外交機關的「顧問」，進行挑釁性活動

以外，還從事着另外一種同樣罪惡性的勾當。他們是反蘇教育的中間人，並且將廉價的勞工在所謂被移置人員——其中有被強迫扣留在外國的蘇聯公民——的偽裝之下輸送到北美洲去。換句話說，他們實際上正幫助美國反動派進行奴隸販賣。

美國外交界中最上層領導人物的甜言密語並不足以掩蓋真實情況，他們那些假仁假義的演說只是企圖隱藏他們爲了反蘇目的而給予一小羣被祖國放棄的賣國賊的支持和積極利用。

但是，這些有關『美國之音』工作人員的評論使我離開了自己的主題。

美國新聞處莫斯科分處在指導美國宣傳政策，建議和報告雜誌及廣播節目的效用以及散發『美國』雜誌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確實，莫斯科美國新聞處還有其他作用。它正企圖實現一個所謂『文化關係』的計劃，以影片，爵士唱片，美國『藝術』的樣本等做工具。

由美國納稅者所支付的這些昂貴物品中的極大部分都可以在大使館一些職員的私人收藏中找到差不多沒有件東西會促進『文化關係』。花在招待費上的大批資金也莫不如此。

應該指出，一般說來，美國新聞處，特別是莫斯科分處，浪費了政府的金錢。貴重的書籍和其他財產消失得無影無蹤，貨物清單所顯示的事實，被小心謹慎地壓了下去，以避免醜名四揚。在和我到來之前，這許多事已經在進行中，雖然我會努力制止了一些，但有理由相信這些醜惡的勾當仍當繼續着。

大筆資金花在出版這本『美國』雜誌上，這本雜誌從頭到尾都是用光潤的雜誌紙印行的，裏

面滿是十色的再版畫，大使館建議要使這本雜誌儘可能的『華麗』，好使『天真的蘇維埃公民贊歎美國的『財富』。

美國宣傳工作的首腦硬說這本雜誌是自給自足的，其簡單的手段就是在成本中不包括政府僱用的編輯，作家和其他人底薪金這些人的薪水遠超過印行雜誌的一切費用。

莫斯科美國新聞處的工作人員過多。大部分原因是高資僱用的隨員，名義上是領導這一組織，實際上却做得很少，只從事於個人的事情和陰謀詭計，而且妨礙着進行一切工作的下屬人員。這些人確實有些『作用』，這是真的，留待以後要討論，但是他們並不有助於美國新聞處在名義上的活動。

從美國人民的觀點來看，這種揮霍從那一方面來說都是不正當的。

莫斯科美國大使館甚至於不知道每月送來的五萬本雜誌有沒有人閱讀，正如大使館財產的喪失一樣，『美國』雜誌的命運是被小心翼翼隱藏起來的特別不讓最後支付賬單的美國人民知道。

大使館所熟悉的、但小心不讓美國人民所知道的事實是，『美國雜誌』在蘇聯並沒有廣大的讀者，而那些閱讀它的人也不重視它。

它的文章只投合極其天真的人們。它把美國描寫得高不可攀，秘密封起，在這個美國農農民的手永遠不會沾上污泥，而產業工人聽到董事會宣佈利潤達到百分之五十的水平時便向後者祝賀，在那裏每個人都住在十五間屋子的大廈裏，每年什麼事不幹還可以免稅拿到兩萬塊錢美金。

這種說法既不能欺騙蘇聯讀者，也不能打動他們，蘇聯人是不喜歡被人當做食乳小兒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每次發現一個蘇聯人在閱讀或者已經看過了「美國」雜誌，那就成爲了大使館的一個重要事件。如果有一個美國人在各省裏旅行，在什麼地方碰到一個曾經讀過「美國」雜誌的蘇聯人，那就值得給大使館寫一個長篇報告，給國務卿發一個專電，以便機密地拿給國會議員們看。從這一點，他們結論認爲「美國」雜誌在碰到這位不平常的蘇聯人的特殊地方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我知道有好幾回，大使館的職員被派到遙遠的地方去旅行，一切開銷由公家付，僅僅爲了搜集這一類的情報。如果他們在莫斯科和海參威之間，能找到一個「美國」雜誌的讀者，那麼大部分人都會認爲自己是很幸運的了。這種「情報」對大使館是寶貴的，因爲可以用它來要求額外資金，花在這個騙人的把戲上。

我記得有一次由於「發現」從維斯寧街新聞處「偷」走了幾本「美國」雜誌在「黑市」上出售，而引起的大轟動。這件事又值得給國務院拍發了一個緊急的密電，並建議應將如此「重要的事件」通知國會議員。這件事被描寫爲對於「美國」雜誌的巨大要求，而其實只不過表明對於近乎廢紙的迫切要求而已，這種廢紙可以——實際也確實——做各種用途。

國務院得到的報告是被偷的幾本雜誌是「以高價非法售出」的，這完全是不正確的。實際上，這幾本雜誌是美國新聞處一個職員故意放在外面好讓人家偷走的。

另外一個詭計是——把幾本「美國」雜誌擲在莫斯科各的垃圾箱裏，希望清道夫和雜役女工拾起來拿給他們的朋友看。

大使館的美國人得到指示在莫斯科各國公共汽車，電車，和地下鐵路上旅行，並將「美國」雜誌「遺留」在位子上，好使「熱心」讀者發現。

莫斯科公園的許多板凳上也會留下幾本國務院的這一「天才」出版物。在蘇聯鐵路上旅行的美國人得到指示攜帶數百本雜誌沿途留在火車站的食堂裏。

如果維斯寧街的雜誌編輯突然接到一封讀者來信那麼新聞處處長馬上就要去見一次大使，如果來函（很少有）同意讚揚某一篇文章時，那就會更加如此了，但是這種信却來得太少了，因此據我所知，大使館的一些職員常常得到很厚的賄賂，用假名子寫幾封寄到維斯寧街來。美國政府就這樣用納稅者的錢支付這些稱讚「美國」雜誌的來函。

新聞處也以同樣的辦法為「美國之音」的廣播節目搜集蘇聯的「反應」。

甚至於大使館中最樂觀的領袖也不相信「美國」雜誌的效力。然而，這個領導集團却對廣播節目寄以鉅大希望。他們對這一節目如此重視以至於查里斯·鮑稜——國務卿的特別助理和反蘇小集團的首腦之一——曾設法使他的舅子查里斯·泰葉出任指導俄語廣播的編輯工作。

在這些蘇聯事務「專家」的幻想中，這一個廣播節目要成為千萬萬蘇聯家庭的催眠曲。它要以美國廣播向本國人民兜售肥皂的方式向蘇聯人民「出售」美國「文化」和美國外交政策。

然而國務院忽視了美國無線電聽眾與蘇聯聽眾中的基本區別。

一個美國人如果聽膩了兜售肥皂的節目，轉到另外一個節目，但使他嫌惡的是，這裏仍然出售着肥皂。實際上，美國無線電台的大部分節目都是替肥皂、飲料、香煙和其他類似的東西做廣

告，因此無線電聽眾很少有選擇的餘地。

然而，在蘇聯，總可以轉掉『美國之音』所送來的美國節目，而轉到小型歌劇、音樂會、演講、新聞節目、戲劇等等節目。

當他能夠聽到他所心愛的蘇聯藝術家所開的音樂會時，沒有一個正常的人會去聽那些用過時的俄語所廣播的、天真的、二等的美國宣傳的。

很明白，『美國之音』在蘇聯是不成功的，差不多沒有人去聽它，雖然每個人都買得起一架收音機，可以隨心所欲，愛聽多麼久就聽多麼久，愛聽多少次就聽多少次。

大使館是知道這種情形的，但是却不要讓美國人民知道。國務院代表對國會的機密談話中說廣播節目是流行的，蘇聯各處都在聽。

當然這是真的，美國政府對蘇聯的官方宣傳節目還有更荒謬的一面，而且浪費着美國錢。但是如果從這些事實中得出結論，認為它沒有更嚴重的含意，那就錯誤了。

美國新聞處的計劃是美國對蘇聯的官方政策的一部分。它是反對蘇聯及其人民的武器，而且是由國務院裏外外控制美國對蘇聯正式關係的整個計劃的一些同樣人物所控制的。

因此，通過國務院整個活動的這一個比較小的領域，可以看到美國的官方政策——如國務院和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官員本身所了解和執行的。

這些廣播，在推進他們的主要任務中，故意計劃來宣傳有關美國生活的錯誤形象和觀念，並且詭譎地提醒蘇聯聽眾只在資本主義之下，這樣的『地上天堂』才有可能。

例如，『美國之音』廣播了與一個美國工人的一次會晤，後者談到他的新的有五間屋子的家。但他沒有說這所房子已經以價值的百分之九十抵押了出去，需要三十年才能償還，而在此期間，如果他失業的話，他就會失掉他的家以及和家在一起的每一樣東西，而被拋到街上去。他沒有提到千千萬萬美國工人將收入的百分之三四十付了房租，常常要住在貧民窟裏，那種貧窮對於一個蘇聯人是難以了解的。他說他有一輛新的福特車。但他沒有說他是按分期付款的辦法買得這輛車，當他失業的時候他就會失掉這輛車以及他投在上面的所有錢。他沒有說極大部分美國工人都沒有新的福特車。

簡言之，『美國之音』的『會晤』歪曲了和竄改了美國生活。國務院的廣播描寫了從未存在，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可能存在的美國。

『美國』雜誌將同樣歪曲了的美國生活的版樣給讀者予其。這便是爲什麼它的文章裏描寫一種不費力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滿了最好的奢侈品，要啥有啥。

『美國之音』將美國外交政策故意加以粉飾，這些廣播把國務院形容爲和平天使，經常受到『好戰』的蘇聯的反擊。

當然甚至於美國宣傳計劃的最圓滑的散謊者也很困難解釋爲什麼美國政府這樣不願意和蘇聯政府一同坐在會議桌前，真正解決美蘇之間的分歧，同時也很困難解釋當前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其他特徵，這個外交政策的一個侵畧性的事實比一百萬個花言巧語還說得更明白。

事實上，甚至於那些創造這些「聰明」計劃的美國官員中最樂觀的人，都不相信他們有任何

可能性去說服蘇聯人民，使他們相信目前的美國外交政策是「愛好和平」的，或者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

他們了解到蘇聯人民是愛國的，忠實的，而且最重要的，在政治上是有教育的，他們信任自己的政府，信任社會主義。他們了解到蘇聯人民中絕大部分是完全不受美國宣傳的影響的，而且絲毫不爲他們那不得不天真的「方針」所欺騙。

但是他們在莫斯科開設美國新聞處，與其說是爲了宣傳工作，不如說爲了諜報工作。

莫斯科美國新聞處大部分領導人員都受過諜報訓練，這絕不是偶然的。

代哈里曼大使領導這個新聞處（當時通稱戰事新聞處）的約瑟，菲利普斯是在西點畢業的，他是一個正式軍官，三十年代中，他「退休」，在蘇聯，意大利和其他國家從事新聞工作，而在大戰的時候又以上校資格恢復了軍職，菲利普斯顯然在他整個生涯中一直與軍事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聯系。當然，盡人皆知，「退休」的陸海軍官經常是美國諜報機關的重要諜報人員，菲利普斯極其可能就屬於這一類。

在菲利普斯離去之後有一個相當長時期指導美國新聞處工作的依靈沙白·伊甘便是一個設法與蘇聯人接觸的極其積極的人物，她藉口與蘇聯人談「戀愛」搜集情報，報告給美國大使裏的一些個別人物，

伊甘後來由阿爾蒙，威里斯代替，後者領導莫斯科美國新聞處直到他在一九四七年初離開爲止。威里斯曾在科羅拉多三十鮑德爾海軍諜報學校受過俄語訓練。

美國新聞處副處長曼寧·威廉姆斯也在同一學校受過訓練，在「威里斯事件」之後，他於一九四七年被迫離開莫斯科。

代替威廉姆斯的約瑟·葆森有一個時期與戰界服務處有關。

代替阿爾蒙·威里斯且直到最近以前一直領導美國新聞處的梅威爾·羅格斯是由美國諜報機關派到莫斯科來「購買蘇聯書籍」的。

因此，很明顯，自從美國新聞處於戰爭期間在這裏成立以來，每一個據領導地位的人都與諜報活動有密切關係，至少也受過諜報訓練。鑑於美國新聞處的計劃的本質，這當然不是令人詫異的，但是無論如何，這一點明確的說明了美國政府對所謂美蘇之間「文化關係」的看法是什麼，甚至當兩國親密聯系共同抗擊希特勒時亦然。

我已經指出像威里斯和威廉姆斯這樣的人物因為「沒有很好了解他們的任務」。而不得不在趕走。但事實是他們顯然是由於他們的資格，包括諜報訓練的資格才被選拔的，而他們未能立功的事實只說明了選擇他們的人犯了錯誤，但這些錯誤很快就被糾正了。

我也會指出我所提到的這些人是從事完成最上級人員所給予的命令，但是這些在最上頭的人員也和諜報活動及諜報組織有密切聯系，戴維斯、杜爾布勞、泰葉、艾倫本人都是間諜，同時又和其他間諜密切聯系着，美國外交事務整個來說就是一個諜報組織。

我在美國新聞處和華盛頓國務院工作期間，曾和這一宣傳計劃中的許多最重要人物，包括杜爾布勞和戴維斯，討論過「美國之音」和「美國」雜誌的作用。我看到材料是怎樣編輯的，也看

到關於美國新聞處工作的評論從莫斯科送到國務院去。我看到美國諜報活動和「美國之音」廣播之間的關係多麼密切。不僅我一個看到了這一點。阿爾蒙·威里斯有一個聲明，這個聲明不僅包括我所提到的一些事實，而且透露了某些其他方面。

阿爾蒙，威里斯事件顯示了大使館及國務院中控制「美國之音」和「美國」雜誌的官員的方
法的目的。

威里斯於一九四六年被國務院派到莫斯科來担任美國新聞處處長，他天真地認為派他來是爲
了促進蘇聯人民與美國人民之間的文化關係和聯繫。

威里斯怎麼能够誤解他的任務，他怎麼能够認爲人家會允許他按照他自己所了解的那樣去辦事，簡言之，他怎麼會以這樣不足的「政治準備」和指教到這裏來，這是很困難了解的，只能夠
斷定國務院什麼人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引起大使館一場真正的風波。這件事完全暴露了大使館
領導人物的真面目。威里斯被開除了，送回家去。

威里斯被選拔出來進行宣傳工作，因爲那些選擇他的人可能認爲他既然以前是一名海軍軍
官，在海軍諜報學校受過俄語訓練，那麼他一定會執行大使館對美國新聞處的活動和這一工作的
諜報方面的各種指示。

然而，威里斯雖然在政治認識上是一個保守的人物，但却具有獨立的見解，他拒絕使自己的
活動去破壞蘇美友誼，如別人對他所期望的。從他的專業觀點來說，他犯了一個極端嚴重的錯
誤，即相信國務院發言人的公開談話——他們希望促進蘇聯和美國之間的相互了解和文化聯繫。

他認為這些聲明較莫斯科美國大使館當局所給的指令（這種指示與「友誼」的公開聲明完全背道而馳）要權威得多。他不明白這些聲明實際上僅僅是一種烟幕，使美國人不知道進行侵畧性反蘇政策的準備。

大使館當然，既不能了解也不能容忍這種「荒謬的天真想法」。

首先儘力破壞威里斯在大使館的地位，使他自己的職員反對他，阻礙他指導自己的新聞處。其次，採取了行動「設法」使他盡早「調」離莫斯科。

威里斯感到了在他周圍所發生的事情。他既不是一個唯唯諾諾的人，也不是一個懦夫，於是他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反擊。

當大使館最後告訴他，他已經被調到布達佩斯去的時候，他感覺到了他們的用意——就是把他從莫斯科弄出去，到一個安靜一點的地方，最後從那裏無須冒險動一時的危險就可以把他開除掉。代替去布達佩斯，他辭去了國務院的職務，而在離開莫斯科之前向一個美國記者發表了一篇嚴峻的聲明，批評大使館的領導並揭露大使館裏的野心政客正利用「反蘇主義」和「仇恨俄國」來升官發財。

盡人皆知，國務院會大力阻止威里斯的聲明大規模散佈開去，他們也轉動了誹謗威里斯的機器。

史密司大使堅持認為威里斯被調走是因為「他不能勝任他的工作」……這是一個奇怪的聲明，因為威里斯從來沒有機會去進行他的工作。

他企圖在公共場會上對威里斯事件一笑置之。私下裏，大使館的官員們則說威里斯一定是個「共產黨人」，並在許多到莫斯科來參加當時正在進行的外長會議的記者中散佈這個謠言。

同時，大使館爲了「報復」，曾採取行動將威里斯列在美國公安當局的黑名单上，使他永遠不能再到美國政府中任職，不論時間長短。大使館的領導人甚至於在私人談話中向我和其他人承認，他們這樣做是爲了澈底恐嚇任何其他可能的「張里斯，李里斯。」

我個人對於威里斯事件十分熟悉，因爲我當時就在莫斯科美國新聞處，我從大使館一等秘書約翰·戴維斯所給我的逐日指令中看到如何美國新聞處無須諮詢威里斯而工作。我也看到戴維斯如何用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將主要精力花在設法使「威里斯」處在尷尬的地位，並毀謗他的名譽。戴維斯一再盤問我對威里斯在新聞處活動的了解以及他的私人生活和政治見解，美國新聞處的其他職員也受到了同樣的詢問。

我從戴維斯的問題中感到他正從幾方面下手。第一，他企圖得到材料證明威里斯是一個懶惰無能的工作人員。第二，他企圖得到使他能夠向大使館當局報告威里斯是親共份子或者實際上就是一個共產黨人的材料。第三，他和自己同一類型智力的人採取着同樣的策畧，企圖讓什麼人斷言威里斯和大使館的職員發生過同性戀愛或不正當的性關係。最後這一點却是一個絕望的企圖，而且是極其徒勞的，因爲威里斯過着正常的家庭生活，每一個人都能看到。

戴維斯最後在威里斯到基輔旅行途中所寫的報告書上找到了岔子。威里斯在這篇文章中報告了他所確實看到的每一件事。他並沒有歪曲他在一個集體農莊參觀以及和基輔一些名流會晤中所

耳聞目睹的一切。交進這種報告來無異向牡牛揮舞紅布，戴維斯大發雷霆，因為他向來堅持每一份報告在轉發國務院以前必須『加以註釋』——當然是反蘇精神的，戴維斯藉大使館人員中一些拍馬屁『專家』的幫助，誹謗了這篇報告，揚言它是無力和親蘇的。這個把戲真正在調走威里斯上起了主要的作用。

威里斯的莫斯科美國新聞處副處長曼寧·威廉姆斯受到了直接和間接的壓力。他們用許多溫和和不溫和的暗示使威廉姆斯了解，如果他能够供給非難威里斯的情報，他可以期望在威里斯調走之後升任他的職位。

威廉姆斯犯了企圖保持中立的錯誤。結果，像威里斯一樣以後被解職了，失掉了在國務院中『升官』的好機會。

就個人來說，我不喜歡威里斯，而且我也不是他的朋友之一。但是，我不能不讚賞他向報界發表聲明的勇氣，這個聲明洩露了或者可能洩露了大使館的陰謀和『仇恨俄國』。

威里斯的聲明使他斷送了在政府中服務的生涯；他不得不在政府外面尋找工作以謀生。這就是他企圖在蘇美事務上與國務院壟斷集團交鋒所付出的代價。

威里斯事件是我所能想到的——而且我也是目睹者之一——卑鄙的陰謀和詆毀的最好實例，國務院的領導過去和現在都不惜使用這卑鄙的陰謀和詆毀，以強迫實行他們的政策和粉碎國務院內的異己。

約翰·戴維斯親自選擇了梅威爾，羅格斯來代替威里斯，羅格斯目前仍任此職。

羅格斯是一個賬房先生和私人偵探混合氣質的人。我已經指出過，他被派到莫斯科來為研究蘇聯問題的美國諜報機關購書和尋覓各種能夠得到的書籍，特別包括技術書籍，這些書拿回華盛頓以後要仔細咀嚼以便得到可能的諜報消息。很可能他還有其他任務。

從戴維斯和杜爾布勞的觀點來看，羅格斯是一個理想的人選，因為他沒有獨立的性格。他是一個小政，也許在國務院之外就找不到別的工作，而且只做人家叫他做的事，從來不超出範圍。他的作用就是扮演一個傀儡，誰也不防礙，並且執行着杜爾布勞所直接給他的命令。當然，他有權提出建議。別人覺得他的諜報經驗也許使他的評語有用。

一旦威里斯被驅逐之後，大使館就將他們的怨仇發洩在威廉姆斯身上，因為他不和他們的反威里斯誹謗運動合作。威里斯離開約三個月後，威廉姆斯奉上面的召見，告訴他，他的工作已經『取消』了，必須回到美國去。

人家沒有告訴他，在他被送回家去的同時，已有另外一個人被派來代替他的位置，並做正是以前指派他來做的工作。至於為何派一個『代理』來担負一個『取消』了的工作却從來沒有說明過，當然每一個人，包括威廉姆斯自己，都知道這只是將他趕走的計謀而已。

目睹了威里斯的遭遇的威廉姆斯看到了災禍的預兆，便投降了。他沒有做出任何不當的轟動事件便離開了莫斯科，到德國，在那邊顯然在美軍政府中找到了差事，他一聲不響保全了官職。他已經瀕頭澈尾受得了教訓。

派來代替威廉姆斯的是約瑟·漢森——羅格斯的密友。漢森以前曾在大使館工作過，他在大

使館是一個有名不會有任何抵抗的人。

羅格斯之代替威里斯·漢森之代替威廉姆斯最後建立了國務院中蘇聯事務壟斷集團對莫斯科美國新聞處的直接與毫無異議的控制。

實際上，威里斯對於大使館首腦之逐日控制全部美國新聞處事務，向來并非真正的障礙。他們將命令直截了當發給下屬並告訴這些人不要去理睬威里斯所建議的任何事物，然而，威里斯的存在每天使戴維斯、杜爾布勞之輩想起他們所期望忘掉的美國，他們想到一種自有主見無須尊重政府的政治目的的美國人民——其中大部分都是不偏不倚的，這一類美國人民中雖然有許多保守份子，但却深深渴望與蘇聯各民族之友誼。

正如我所指出來的，大使館的戰事新聞處和後來的美國新聞處，從它在算莫斯科工作的起點，一向掩護大批正式的諜報人員。

這類諜報人員在過去是非力浦斯上校，依麗沙白，伊廿，阿爾蒙·威里斯以及最近的梅威爾·羅格斯和約瑟·漢森。最後兩個人過去曾是戰畧服務處的正式職員。他們在美國新聞處的工作只是進行積極諜報工作的掩護。

一九四四年羅格斯是戰畧服務處編輯參考資料組組長，在這一組裏集中了一切有關蘇聯的官方出版物。

據大使館中所流傳的謠言，羅格斯帶了特別指令到蘇聯來，在技術諜報範圍內進行工作。

我在美國新聞處裏任羅格斯的行政助理與他共同工作的期間，逐漸確信他利用他的公開地位

，做爲進行其主要工作的掩護。

根據我的觀察，我可以說他曾設法搜集有關蘇聯的諜報轉發到華盛頓去。

羅格斯對蘇聯及其人民的態度，正如大使館全體領導人員一樣，是極端不友好的。例如，我還記得一次談話，在這次談話中，羅格斯揣測美蘇之間會發生戰爭而且美國會戰勝。他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再沒有比回到蘇聯來就任某個蘇聯城鎮的『佔領軍市長』更喜歡的了。然後他就可以做給蘇聯人看他對他們真正怎樣想法。談到蘇聯人的時候，羅格斯毫不猶豫地用最輕蔑的名詞。

這就是一個美國諜報人員的肖像，他本來是應該指導蘇聯境內的美國新聞工作，促進蘇聯與美國之間『更親密的文化』關係。

與威里斯爭執在莫斯科發生的時候，爭收控制美國宣傳計劃的鬥爭正在華盛頓進行着。

當反蘇集團爲查里斯·泰葉謀得指導俄語廣播的職位時，他們贏得了一次重要的勝利。

當他們爲喬治·艾倫——曾任美國駐伊朗大使——謀得負責全世界各美國新聞處之助理國務卿職位時，他們更取得了另一次勝利，而且是一個更加重要的勝利。

艾倫在德黑蘭的時候寫了許多比當時莫斯科發出來的任何東西都更爲反蘇的電報，使自已立了功。他以親自干涉伊朗內政在德黑蘭證明了他有做反蘇外交人員的才華以後，便得到了這項工作做報酬。前此擔任這個職位的威廉·班頓因爲不能應付外交工作的需要而被解職了。

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或華盛頓國務院內各個集團的秘密的、和某種程度上的個人的陰謀詭

計，如果沒有政治意義，或者如果不是加強一個固執的、有野心的、決心永遠不使蘇聯和美國之間有和平的人物集團之力量的武器，那麼也就沒有什麼重要性，或者也就不值得一談了。

第六章 美國大使館的投機商

在美國，商業和投機之間是沒有界限的。真的，用最低的價錢買進來，用最高的價錢賣出去，可能的時候就合法幹，必要的時候就非法幹，有用的時候就老老實實地幹，更加有利可圖的時候就背信棄義地幹，再加上最大限度的欺騙——這不叫投機而叫商業，投機帶來很大的收入，在美國，隨收入而來的就是社會地位。

在美國重要的東西是錢，至於如何到手則沒有關係，如果有一個美國人在法律的範圍之內，靠「老老實實的努力」獲得了利益，那麼就有三個人是用了在其他社會裏被坦白認為是海盜或土匪的方法發財致富的。

盡人皆知，約翰·洛克非勒是用頑強的、不正當的、無賴狡猾的、和盜竊的方法獲得了財富的，這種行為用千百萬美元獻納給慈善事業也洗刷不掉；可是他的後代在社會登記上却比湯姆·愛迪生的後代評價來得高，雖然後者也並不窮。在美國，如果有一個人可以用購入一件東西所付款的兩倍去出售而不出售時，那麼他就會被認為是一個笨蛋。

投機鑽進了華盛頓政府的心臟。去年曾經揭露，美國京城一些地位最高的人（包括杜魯門會有意提拔為陸軍部長的鮑萊，總統的私人醫生以及好幾百個「小嘍囉」）會利用有關政府穀物出售和購入的秘密情報，在穀物市場上投機。這些人受到了共和黨人的批評，因為當時選舉年就要到了，但是沒有一個人因為他的活動而受到任何懲罰或真正的不方便。

國外的美國人特別熱中於投機。在美國本土，投機至少在某種程度之內是一種職業，而且只限於較少的人數。在國外，全體美國人，老老少少，地位高的和地位低的，政府工作人員和私人企業的職員似乎都染上了投機狂，自從戰爭一開始，歐洲各處的情形就是如此，現在仍然繼續如此。

這些美國人之中有些做咖啡和香烟的買賣；有些人賤價或一文不出收購整個企業，然後以大價售出。

每個意大利人都知道過去是誰在供給意大利的黑市，現在又是誰在供給。每個德國人一定都知道是誰在英美佔領區乘他們的艱難和飢餓，壓迫他們出賣傳家寶來換取香烟和咖啡。許多奧地利人都知道誰正在將他們的整個國家窺竄一空，實際上又是爲了弗吉尼亞和北卡羅來納製造的香烟。各式各樣的美國商人似乎担心中，如果他們今天不去把它偷來，那麼別的美國人就會捷足先登了。

在國外看到這一切正在周圍進行的。誠實與正派的美國人對於這一情況感到不安和關切，但是却絲毫無能爲力。

那些企圖干涉的人甚至於往往在他們沒有干涉以前便遭到了暗傷，被解職或被調到別處去，那些想要抵抗這個制度的人時常到最後反而全心全意地參加進去，加倍投機，來彌補開始前所損失掉的時間。

在這種氣氛之中，美國外交人員從上到下，也從事大大小小的投機，是絲毫不足爲奇的，而

且他們會努力將這一種美國道德輸入蘇聯，也沒有什麼奇怪的。

幾乎莫斯科美國大使館中，每一個人都從事或多或少少的投機，或者是利用外交豁免的特權非法輸入蘇聯貨幣，或者在外交關稅豁免的條件下輸入免稅貨物，如烟酒等類，然後以巨大的利潤賣出去。

一些進行大規模投機的大使館人員回家去時，確實帶上價值幾十萬美元的不義之財，這些錢財，經常用寶貴藝術品的形式（利用外交特權輸送出口）；有時也用現鈔和支票的形式隱藏起來。雖然在莫斯科大使館裏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但是每一個人也都知道還沒有任何人因為這種投機而被國務院開除過，用外交護照旅行的投機大頭子確實沒有被開除的。

在莫斯科大使館中用制裁方法來中斷這件事是不可能的，雖然名義上不時也會宣佈相當嚴格的規則。這些規則只是爲了顧全面子，誰也不預料大使館會廢止投機。

何以如此呢？

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何以投機仍然大規模地繼續着。

一九四七年末，大使館裏舉行了一次調查，要找出誰在進行投機，用什麼東西，有什麼效果。應該指出，調查進行的時候，正是蘇聯貨幣改革本身使投機困難增加因而也減少了其吸引力的時候。換句話說，這是「亡羊補牢」的一個理想例子。除此之外，進行調查的目的，除了拔出一些可以爲整個大使館做替身的小嘍囉外，并非真正要找出有關投機的任何毒物，而是特別爲了粉飾大使館中波波從事大規模投機的最高級人員。

一個委員會成立了。包括大使館和海陸軍代表。這個委員會將大使館的職員和官員召來，詢問他們有關投機的事實，鼓勵他們招出別的美國人（特別如果後者是一個低級僱員）。

出席這個委員會的大使館代表是莫斯科的最高級的職業外交家——杜爾布勞顧問。大使館的許多職員都知道他是大使館中積極進行投機活動的人。

舉例來說，有一些職員確實知道杜爾布勞是從華沙到蘇聯來的，他在那邊的黑市上買了一整箱盧布，兌換率不一，最高的僅及合法兌換率的十分之一。他利用外交特權將這些錢帶到莫斯科來自己使用，或者用各種方法出售或兌換成美元，對於一個和大使館會計制度有密切關連的人這些方法是很便利的。

和我有相當長時間住在同一宿舍裏的一個女職員不僅直接知道這件事情，而且報告了國務院。杜爾布勞因為這個女孩子知道他的事，很怕她，最後還是設法把她調開了莫斯科。

杜爾布勞在其他方面揭把活動也是許多大使館職員所共知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調查沒有什麼成效，而且也不能引起別人的重視，是絲毫不足為怪的。

這個委員會詢問我的時候，我拒絕在這個問題上說出任何事情，因為很明顯，他們企圖將責任推在一些渺小而無以自衛的人身上，然後便可以通知國務院說，調查已經證明沒有任何「外交人員」糾纏在投機中。

實際上，結局正是如此。被選擇的犧牲品倒是一個很可愛的善良人物，牙醫的助手。報告中正式指責他是進行投機揭把的首腦份子，還有一兩個人也被指責糾纏在同樣活動中，全體都

被送回國去了。一切具有『外交階級』的人員都免除了非難，仍然留在蘇聯或其他地方繼續他們的投機活動。

我舉了這個例子，因為它說明了大使館最高級人員從事投機活動和他們不能使其停止的程度，因為繼續下去對他們的私人利益有好處。既然這些人進行投機，就不可避免要使下級人員知道，也就不得不容忍下級人員也從事投機。事實上，他們常常利用下級人員進行自己的勾當。

甚至於史密斯大使也不免插足在卑污的投機活動中。他從事某種曖昧的交易，這種交易對於美國駐蘇大使這樣高的職位是極其不相稱的。

有一次大使館的「萬事通」班得爾——他也替大使辦私差——告訴了我他在商業投機中的一些失敗，他說史密斯大使叫他在市場上去賣的成套西服，自來水筆和香煙沒有銷路。但是他的上司却逼着他要錢。

大使館的另外一個職員薩格羅德尼，當通訊員的，也告訴我他常常得到史密斯大使的私人命令去出售金元——美國的十元錢和古巴的十元比索錢——和錶。薩格羅德尼誇口說他最近賣出了史密斯大使令他出售的價值二萬五千盧布的金元和錶。

莫斯科許多美國人都知道這件事。當然，它也就調整了整個一羣人的步調。

莫斯科的美國人的投機方法是什麼？

第一是（或者已經過時了，因為自從貨幣改革之後，這已經幾乎不可能了）利用外交特權非法輸入貨幣。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以前，外交人員可以旅行到德里蘭，華沙，布加勒斯特，布達

佩斯和其他京城，在那裏購買蘇聯的盧布，其中大部分都是偽造的。兌換率從六十到一百盧布兌一元，而莫斯科外交人員的法定兌換率是十二盧布比二元。這些盧布可以利用外交的特權輸入進來，在這裏做爲私人花銷，同時也可以二十到三十五比一元的兌換率轉賣給其他美國人。大使館的一些美國人有各式各樣的方法將這些盧布以十二比一元的兌換率轉回國務院去。結果許多美國人在美元上賺了大筆錢。

第二，非法出售免稅輸入的商品。例如，可以以一塊美金，包括寄到莫斯科的郵費購買一條香烟——以外交兌換率相當於十二盧布——而以一百或一百五十盧布——相當於八又三分之一到十二又二分之一美元——轉售出去，售得的盧布可以再換回美元，或者可以用來購買古董和藝術品；其中有些是很珍貴的。

美國人在近十年中會違反蘇聯出口條例非法輸出了許多俄羅斯聖像，這些聖像後來皆以巨利售出。

有些美國人——事實上很多美國人——離開蘇聯時帶了三三十個箱籠什物，時常重及一二噸，這樣說絕非誇張，所有這些行李都享受外交特權，不受蘇聯海關當局的檢查。

我知道差不多沒有一個在莫斯科大使館呆過的美國人回國的時候不帶一些寶貴的書籍、珠寶、古董、照相機等。

第三種方法是在從事美金交易的美國人或其他外交使團的人員之間非法出售美元貨幣。在蘇聯實行貨幣改革之前，一塊美金經常以原兌換率三倍至六倍之數被收購。

怎樣能够證明這些罪狀呢？首先，在這裏呆過的任何一個誠實的美國人都能够證實這種情況。每一個在大使館工作過的人都知道這件事，或者知道那些經常能够以官價的一半，無限量出售盧布的人，但是還有其他更具體的證明。

例如，檢查一九四六年夏末以前大使館官員的賬目，會說明在整個戰爭期間和戰後將近一年半中，在大使館工作的美國人有許多沒有通過官方機關（大使館和蘇聯銀行）購買過一個盧布，有些人只購買了極少數量。維持『體面』。

這是國際黑市交易的足夠證明，因為以特別外交比率兌換盧布的惟一合法來源就是通過大使館和蘇聯銀行。因此，這些盧布都是以更有利的兌換率從別的地方得到的（盡人皆知大使館的人員都是善於揮霍的），這意味着美國納稅者受到了欺騙，因為政府在此期間一直根據十二比一的盧布兌換率付給莫斯科美國人很大的特別津貼。換句話說，大使館人員假藉口實換取了特別津貼，這一點是大使館中人所共知的。

一九四六年夏末，全體職員得到命令，購買盧布不得超過生活費。從這一天以後的記錄說明，至少到一九四七年末，差不多沒有一個人購買了較他所絕對需要的更多盧布。

合購來的盧布數量在這個時候並不够美國人的生活費用。對證一下極大部份美國人爲促使大使館間國務院要求對莫斯科工作人員支付更多津貼而向大使館提出來的生活費報告便可以得到證明了。這些報告列舉了大使館中大多數人的花費，如果仔細研究一下，並且與他們每個人實際購入的盧布數量比較一下，那麼就會說明他們所花費的盧布中將近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是合非購來

的，其餘的都是由投機活動而來的。目前，莫斯科外國人的投機活動仍然繼續着，但是蘇聯政府已使這些活動增加了困難。

另一個對證，就是審查一下過去兩三年中外交人員，包括軍事人員的，旅行路線。這個記錄會說明極大一部分具有外交特權的官員，都是經過華沙，布達佩斯、或其他有貨幣黑市交易的地方到莫斯科來的，這些外交人員中幾乎全體都經常旅行到華沙，布加勒斯特和其他能够購到黑市貨幣的地方，他們成羣結夥地幹。一個人被派出去替三四個人買盧布。大使館中沒有外交特權的下級職員很清楚這件事。它成爲了極大不滿的泉源，並且引起了惡感，因爲下級職員不得不以較高的兌換率從這些外交官那裏購買盧布。

再有另外一個證明便是運往莫斯科，交給大使館及其工作人員的巨量貨物。蘇聯海關毫無疑問一定有許多關於這些運輸的有趣數字。這些數字可以說明，直到最近以前，莫斯科的美國人，每年爲大使館的每個男人，女人，小孩接到數噸有餘的貨物。這些數字還可以說明平均美國人每月要購買一箱餘或者兩箱酒，每星期兩條到三條香烟。它們同樣可以說明在配給制度實施的時候，雖然全體美國人都得到極其豐碩的食物配給——例如，較英國的配給量多二倍至三倍，超過美國平均每一個人的食物消費量——但是美國大使館仍然輸入遠較其蘇聯配給量爲多的食物，或者有兩倍之多。從明顯美國人是爲了投機搗把才輸入的，他們在市場上售出了大量酒，香烟和食品。除此之外大量傢俱，衣服和私人用品也被輸入進來，海關的記錄也可以說明當美國人離開時差不多所有傢俱和汽車都沒有帶出蘇聯，雖然國務院曾爲這些物品支付了運輸費。換句話說，這

些東西都在市場上賣出去了。

在一九四八年間，這些活動大大地減少了。必須強調指出，這并非美國大使館主動做的結果，儘管有裝模做樣的調查和嚴格規則的大吹大擂，但只要最高外交人員一天還是投機搦把的首腦人物，那麼誰也不願也不能強迫執行這些嚴格的規則。投機的減少是蘇聯政府主動做的結果，它採取步驟阻止美國人將無限制的免稅貨物輸入莫斯科。

目前，大使館有一定的輸入數量，在這個數量之內它可以隨心所欲自由輸入。這是一個很大的數量，總數每年幾達二十萬美元。大使館中每個男人，女人，小孩平均為一千餘元。

蘇聯政府不會干涉在這個數量之內的輸入，但是它會採取步驟停止以前所發生的巨量非法輸入。

除了定量的輸入，完全免稅以外每個新來的人都許可其免稅輸入全部家庭用俱，這些用俱可能達五噸或半噸。此外，外交人員還可以而且確實利用外交的許可經常至少帶入一噸貨物。最後，每月送到大使館來的外交袋往往重及數噸，其中百分之五十是寄給大使館人員的衣服和各種私人用品。

這並沒有阻礙大使館企圖將蘇聯政府拒絕允許無限制輸入免稅貨物去進行投機的问题造成大的國際爭執。聽說有些人甚至於利用蘇聯當局的這些防禦措施做藉口。威脅斷絕外交關係，有些人抱怨說他們沒有免稅的輸入品不能生活，而且竟敢將這個事情當做問題在美國報紙上發表描寫他們自己快要餓死了。

當然，問題並不是大使館的美國人有什麼困難，因為他們有難得的機會生活在歐洲少數取消配給制度食物豐富的一個國家裏。問題是否允許莫斯科的美國人繼續以免稅的非法輸入品進行無限制的黑市交易和投機搗把，從而將他們的、資本主義的、道德和實踐的體系運用到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裏來，在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中，投機搗把是可以當做罪惡來懲罰的。

目前美國人在投機活動中所碰到的困難還由於蘇聯的幣制改革，使他們沒有機會在國外購買大量的偽造盧布，非法輸入在蘇聯轉售。

然而，美國外交人員是頑強的，他們在自己權力之內，爲了恢復前此規模的投機活動，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他們在整個任職期間，喝的是免稅威士忌，吸的是免稅香煙，住的是不出房租的公寓，而且享受免稅的生活津貼，但是除此之外，他們還要從事投機的『商業』交易。美國外交人員在西歐、中東、南美和非洲各國從事投機，他們能够在這些地方強迫各國政府答應他們輸入無限數量美國貨物來轉售。他們認爲這就是他們的主權，而且企圖將這種所作所爲帶到蘇聯來。

我寫的大部分都是在莫斯科時美國，人的所作所爲，因爲我在大使館呆過，日以繼夜的聽着所謂『黑市談心』，論到香煙、衣服，汽車和麵粉的零售和批發價格。悲慘的事實是，這種事情竟以各種不同程度在全世界各地的所有美國大使館中進行着。

如果僅僅因爲這個問題鮮明地說出了美國外交人員在道德上的墮落，那麼花費這許多篇幅來談也是值得的。它說明，甚至於這樣一羣經過高度選擇、一般生活優裕、在尊重匪盜行爲的國度裏受教育的人所墮落的程度，我所例舉的事實說明了這些人爲何不重視做美國人民的可尊敬的代

表，如何最高級外交人員染上了投機狂，而差不多到了一種不可救藥的地步。這些就是在蘇聯的美國官方代表的道德水準。

第七章 美國統治者爲什麼要揮動大棒

當我回憶起在美國的生活時，一個悲哀和憂鬱的印象壓倒了其他一切。我記得報紙上那些大而黑的標題，預測着新的戰爭，宣傳着新的戰爭，號召着新的戰爭。我仍然聽到那些無恥的戰爭鼓動者的演說，他們步着戈培爾的後塵，歌頌戰爭是最痛快，最贏利的買賣。不管這樣做對我會是多麼痛苦，但我必須承認戰後的美國正處在空前戰爭狂的魔掌中。

我既不是一個職業經濟學家也不是一個職業社會學家，甚至於我也不想冒充美國社會與經濟的「專家」。我只能夠談一談任何一個能閱讀、能客觀和獨立觀察事物的普通人所共知的一些同樣事實。我願意從一個普通人的觀點出發，試試看解釋一下美國今天所發生的事情。

自從德國和日本被擊敗和戰爭結束以來已經有三年了。但是美國的陸海空軍仍維持着動員的編制。我們的部隊實際上在全世界各地都有。

戰後的美國正以千百萬億美元花在軍火上。原子彈工廠仍繼續開工，大筆資金又被批准去供空軍之用。美國海軍在許多方面仍按照戰爭編制。在美國的和平時期歷史上，第一次通過了一個徵兵法。戰費吞噬了我們龐大預算的極大部分。

最後，舉世皆知，新戰爭的宣傳在美國達到了聞所未聞的程度。戰爭挑撥者不但沒有受到懲罰，而且得到種種鼓勵。

我所說的不僅是那些天天在報紙上和無線電裏頌揚和主張新戰爭的新聞棍徒，如德魯·皮爾

遜，華特·溫契爾，及阿爾索浦兄弟之流。美國政府的重要官員，包括武裝部隊的首腦們，也公開號召無需警告便向「敵人投擲原子彈」，做爲「防禦性」的措施。聽到我們那些將軍們的演說，真會驚感到旅順口和珍珠港的背信棄義的例子，已經不是日本傳統而是美國傳統的一部分了。

我十分確信，我的蘇聯朋友們會了解到這一切危險的玩火絲毫不符合美國人民的精神。我深信我的蘇聯朋友們一定能够在美國人民和那大言不慚、蠻橫無禮自稱代表全體美國人民的冒險家集團之間劃一條界限。正是爲了這個原因，所以我要把有關美國戰事狂的全部真相講出來，並說明它的實際動機。

戰爭販子提到蘇聯方面對世界和平的可能「威脅」——他們斷言這是爲了取得「世界霸權」——來公開證明這一切刀劍的揮舞和軍備的建設是正當的。但是，甚至於美國的大名鼎鼎的「俄國問題專家們」，包括那些熱心支持美國軍國主義化計劃的、最反動的新聞工作者和國務院代表們，也都十分知道蘇聯是不需要戰爭的。我確巧知道有好幾回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裏最激烈的反蘇份子私下裏就這樣承認過。

的確，誰能够否認蘇聯已經復員了它的戰時部隊，而且這些被復員的戰士已經在田野上，工廠裏和其他和平專業中參加工作了呢？連續三年來蘇聯已經一年比一年減少了其軍事預算，沒有通過任何特別軍事信貸，怎麼能够隱藏這個事實呢？蘇聯已經宣佈了未來十五年至二十年經濟計劃的大綱要和未來五年經濟計劃的詳細綱要，人們怎麼能够不重視這件事呢？

雖然美國政府的領袖們會散佈譁言說蘇聯正以國民收入的極大部分從事戰爭準備，但美國的

統治集團十分明白蘇聯人民正以一切力量孜孜從事於經濟恢復和發展。蘇聯的武裝部隊並不像美國部隊那樣散佈在全世界，他們是在家裏；在蘇聯。只有一些蘇聯佔領部隊恪守國際協定暫時留在奧地利和德國。蘇聯政府已經正式建議在簽訂了和平條約之後，在最近將來從這些地區撤退其駐軍。只要美國和其他佔領軍同樣效法。最後蘇聯領袖在報紙上、廣播中和集會裏都不會也不會發表反對任何人的威脅性公開聲明。而且普通的蘇聯公民也不會發表這樣的聲明。

因此，蘇聯人不要戰爭，蘇聯也不要戰爭。任何一個神經健全的人都不會懷疑這點。那麼到底誰要戰爭呢？美國爲什麼要進行瘋狂的軍備競賽呢？這個問題應該從美國社會和經濟制度的禍害中找到答案。

十年中，從一九二九的崩潰到一九三九年，美國一直處在不斷的不景氣中。工業生產很低。一切工業只部分地使用其生產能力。另一方面，農業產品找不到市場，穀賤傷農。

整整十年中，失業一直繼續着。影響及於五百萬到一千五百萬想要工作但找不到工作，即使按照當時一般吃不飽的工資也找不到工作的青壯年。國家的情況日益惡化。許多人挨餓的時候穀物却種得很少，每個人都需要消費品的時候，生產却是有限的。只有戰爭的到來使美國的經濟以全部速度，全部生產能力轉動了起來。戰爭對美國資本家是洪福，因爲他們賺了千萬億美元。數百個新建築的工廠擠滿了戰爭訂貨。美國的工業效能大大地增長了。

然而，戰爭結束以後怎麼樣呢？大小戰爭工廠都失掉了軍事訂貨，生產減縮了。

一些不懂得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天真讀者也許會問：『那麼怎麼樣？把戰時訂貨改變爲平時

民需訂貨好壞。讓那些戰爭工廠替人民生產貨物，不要生產大砲吧！蘇聯正是這樣解決其轉變問題的。但是在美國，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事情就完全兩樣了。一個資本家只願意生產一定量的貨物，而且只有在保證他以厚利的特定價格下才去進行生產。當價格上漲而普通工人和農民的收入下降時，生產品就沒有市場了，結果便產生了新危機的幽靈——另一次蕭條，較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九年我們所經歷過的危機還要更嚴重。

這就是那些在美國將國家投入新軍備競爭的人底冒險陰謀和那些懷抱着取得世界霸權的份子底計劃之根源。

華爾街的大王們很願意成爲世界上一切貿易市場的主宰。他們夢想着剷除一切競爭者，用美國貨充斥全世界。最後但很重要的，由於美國政府犧牲了美國納稅者的利益，向各個工業康采恩所提出來的戰爭訂貨，使他們的利潤日益增多，他們的利潤迅速增加起來，正如在『過去打仗的好年頭裏一樣。

另外一件不應忘掉的事情，便是軍國主義的來臨就預先決定一種直接轉變到一個半法西斯，甚或純粹法西斯的國內政治制度，在這個政治制度之下，一切積極反抗美國統治集團的冒險政策的『激進派』，『共產黨人』和其他不滿份子，都可以受到警察行動的猛烈鎮壓和逮捕。

盡人皆知，在美國歷史上，這一點從來沒有像今天表現得這樣明確。瘋狂的特務搜索，對美國進步人士的無數逮捕，通過一系列反勞工法律、承認美國公民的基本政治自由等等——這就是戰後美國的特點。我爲自己的人民懷着一種沉痛和羞愧的感覺，必須承認美國的戰後道路，在各

個令人恐怖的細節上都和引導德國走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道路相似。

也許有人會問我，爲什麼新戰爭的鼓吹者和組織者在這個喜歡向全世界廣播它是民主聖地的美國不受到懲罰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又要考慮一些美國的特殊方面。如我在別的地方所說的，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賺了一大筆錢。當然華爾街的大王們首先擴大了他們的財富。如果我們對於美國其他階級也在戰時利潤中分得了一部分的事實熟視無睹那就錯誤了。這一情形多少影響了美國的整個政治情況。

我將試用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點。

約翰·瓊斯是紐約的一個銀行家。他和他的伙伴們插手於全美國各種企業中。約翰·瓊斯本人是一家汽車公司、一家飛機製造公司和一個大的電影製片公司的董事長。他和廣告公司及報紙向他向這些公司和報紙的老闆貸給信用借款——有密切的私人來往。他又是參議員和內閣人員的密友，時常給他們各式各樣的「恩惠」。

在不景氣的年代中，約翰·瓊斯的各個公司都虧了本；瓊斯本人也感到了不景氣的影響，他的個人收入從一九二九年的百萬元降低爲幾年後的數十萬元。在戰爭期間，他彌補了不景氣時代的損失，而且比那致命的一九二九年更闊了。有他私人投資的公司和受其銀行控制的公司會向政府出售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貨物。

他現在的營業又獲得了巨大的利潤，而且還擴大着他在國外的營業，收購英國、法國、德國

的股份並在日本和中東建立強固的立足點。約翰·瓊斯贊成軍國主義，因為花在大砲和軍火上面的每一元錢對於他所代表的公司和他個人都意味着更多的利潤。他自然贊成馬歇爾計劃，因為馬歇爾計劃保證了他在西歐的行動自由，好擴張他在那裏的金融與商業活動，他贊成美國在國外的經濟與政治擴張，因為這種擴張便是他的化身。他並不反對與蘇聯作戰，因為他知道蘇聯有世界上最豐富的天然資源，他倒很願意插手其中。

他知道只有在美國培養一種戰爭狂才能把軍國主義的思想「賣」給美國人民。於是瓊斯及其公司所資助的報紙，瓊斯購有股份的影片公司出品，瓊斯的銀行所津貼的廣播電臺節目便培養起一種戰爭狂來，而且這種戰爭狂也出現在瓊斯所供給的廣告上。他的意見便反映在那些他出資幫助進行競選的參議員和國會議員的行動上。

而且，不僅只有一個瓊斯，還有好幾千個大大小小的瓊斯，他們都同樣思想，他們都生活在經濟危機的恐懼中。而他們所看到的出路，就是引向戰爭的政策，瓊斯和他的朋友們影響着輿論。

瓊斯是屬於社會階梯的最上一層的。現在讓我們研究一下一些「較低層」的人們吧。

約翰·史密士在工廠中工作。他所閱讀的報紙反映了銀行家約翰·瓊斯的見解。他甚好迷惑，在政治中摸不清道路。但是他知道在三十年後的飢餓和悲痛中他曾躑躅街頭好幾年。

他記得只有在一九四零年戰爭爆發以後，他才找到了職業。他做了充分正常時間的工作，得到很高的工資，加班的時候工資變倍照付。他現在在每星期工作三十五小時，但是他知道如果他的

工廠得到戰爭訂貨，那麼他就會每星期工作五十或六十小時，而得到將近三倍的收入。他在原則是反對戰爭的，但是他却肯定的贊成自己的收入能增加三倍，即使這意味着更苦些的工作也好。因此，他寧願不去想他的工廠裏出產的大砲在和平時候究竟作什麼用。

珍妮·杜的丈夫是農民。在三十年代裏，他們失掉了自己的農場，變成了佃農。他們辛勤工作努力掙扎，但是永遠也沒有走到收稅人的前面去。然而戰爭到來以後，糧食價格上漲，農場所出產的一切東西都有了市場。杜農民沒有參加戰爭；他做爲一個生產的農民可以免役。他們又買了農場，購置了新的農場用的機器，並且在銀行裏儲蓄了一萬元。

戰爭結束後，杜農民和杜夫人開始懷疑他們是否能夠出售他們的小麥。他們贊成馬歇爾計劃，因爲別人告訴他們馬歇爾計劃可以給他們的小麥找到市場，像約翰·史密斯一樣，他們也閱讀反映瓊斯的見解並斷言蘇聯要挑起戰爭的報紙。他們不贊成戰爭，但是在上一次大戰中小麥竟漲到了這樣高的價格！所以他們投票贊成那些實行着引向戰爭的政策的人們。

我絕不是要給人一種印象，認爲所有美國工人都按照約翰·史密斯一樣想法，所有農民都按照杜氏家庭一樣想法。但是要忽視這個悲哀的事實——即我們仍然有不少人像他們這樣思想，那就是錯誤的，這些被蒙蔽和被欺騙的人們，由於他們的被動性使大小瓊斯操縱了一切。

不用說美國還有千千萬萬其他人，他們解在這個原子世紀裏，戰爭對於美國無異民族自殺。在美國每天都有更多的人了解華爾街冒險家的致命政策會把他們帶到什麼地方去。他們的聲音在開始大起來了。我確信這另外一個進步的美國仍然會令人注意聽到它所說的話。然而在今

的。美國。公。天。
和平的。我。登。的。
而。當。想。一。美。
努力。我。這。國。
，原因。是。政。是。
，因。想。三。治。大。
個。也。到。十。權。小。
國。是。美。年。力。瓊。
家。爲。時。代。在。斯。
能。什。時。時。他。在。
够。麼。這。當。手。發。
不。我。就。赫。要。號。
願。要。是。勒。勤。施。余。
一。選。是。來。到。他。們。
切。擇。我。腦。行。利。他。是。
困。這。我。海。軍。個。美。
難。樣。一。的。主。權。的。
在。個。國。家。的。義。力。僞。
和。平。的。家。住。下。的。主。人。
道。路。上。去。的。印。象。計。美。
保。持。不。斷。的。這。就。是。上。他。
迅。速。前。進。這。個。國。所。發。生。的。事。情。在。一。條。最。後。引。向。民。族。自。殺。的。道。路。
天。爲。什。麼。不。願。意。生。活。在。這。條。道。路。上。

第八章 我對蘇聯的印象

我到莫斯科來以前，國務院有人告訴我說俄國人會怕我，而且會不願意和我談話。

來到這裏兩三個星期之內，我發現不但和我接觸的許多蘇聯公民不怕隨便看見我，不怕自在和我談話，而且他們都是誠懇的、友善的、和率直的人們。我覺察到事實上他們比我或是莫斯科美大使館任何其他僱員更應該善於款待客人。祇要想想大使館天天都在指揮着它的分裂蘇美人民友好關係的政策，並且花費大量金錢用在反對蘇聯人民及其政府的特務工作和敵意宣傳上，我們就沒有絲毫權利希望他們這樣週到的款待。

我到莫斯科以前，人家告訴我祇要我到了莫斯科，就不可能再到城外去旅行，而且蘇聯當局會想盡一切辦法去阻止在莫斯科的美國人觀察蘇聯，熟悉蘇聯生活。

當我到莫斯科以後，我發現不僅能夠自由自在地在莫斯科城外遊覽，不受干涉；而且在莫斯科城內外的地方當洞，旅館、博物館、文化機關、歷史古蹟等等的行政方面對於需要他們幫助的外國人都盡量幫助並優渥招待的。

我發現有許多美國人在蘇聯各省旅行不受限制，而且得到當局儘量幫助，在旅途中受到優禮款待。我個人就和許多蘇聯朋友、美國朋友參觀過許多城市，和莫斯科文化勝地。我住在旅館裏參觀博物館、寺院教堂，從來沒遇過禁禁止入內，除了得到非常關切之情以外沒有別的特遇。我參觀鄉村小學校的時候，教師們常常講我和同去的一些其他的人分享他們的款待，並將他們向

工作和問題告訴我們。

我記得很清楚，我曾坐在一家鄰近莫斯科的集體農氏家中的桌旁。我們出門遇雨，到他家去避一避。他請我們進去，並且請我們吃午飯，有黑麵包、鹹肉、紅柿子、黃瓜和茶與沃得加酒。

他告訴我們他的兒子在前方犧牲了；他本人也和德國人打過仗，以後他回到家園重建被德國人破壞的房舍。他告訴我們他對於更好的生活的期望以及他如何去達到的辦法。他為美國與蘇聯的友誼而舉杯祝賀。當我們要離去的時候，他請我們再去看看他。

好象祇是昨天的事情似的，我記得一九四七年夏天我到放德薩附近黑海沿岸的一次訪問，我也記得在那裏一個烏克蘭家庭數週中所享受的熱情款待，當我離開時那誠意的告別，和請我再來的盛意。

到莫斯科後不久，我發現有許多美國人下流地濫用蘇聯的款待，利用到莫斯科外邊去旅行的自由去進行特務工作。他們旅行的費用由政府經費中開支，這是為了搜集情報而特別撥給的，情報以後送到國務院去。這些報告對於會款待和幫助原作者、把他看作朋友的人民極盡毀謗。

使我憤怒的是我發現了那莫斯科和較遠地方自由自在旅行的美國人正是那些散佈他們「不准旅行或熟悉蘇聯生活」謠言的人們。如果在這些美國人當中有一些人發現現在比起一九四六和一九四七年較為不容易旅行的話，那他們只有理屈而已。蘇維埃人民明白了解那些「客人們」是爲了要捏造污蔑的謠言並且由他們那裏偷挖情報才去訪問他們的。

在華盛頓和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時，有人告訴我蘇聯爲要取得世界霸權正在準備對美戰爭。

我發現凡是我和他們談過話的每一蘇聯公民都毫無例外地有一種祈求世界和平的渴望。和蘇聯各界人士談話，我發現共產黨員以及蘇維埃政府人員和其他蘇聯公民一樣熱烈希望與美國的長期和平友好關係。

我發現蘇聯人民一致對於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不管反蘇頭腦的美政府官員對於蘇聯的顯然敵意如何。

在華盛頓和在大使館，常常有人告訴我說蘇聯公民對於美國與美國人民的看法已被有系統地歪曲了。

我發現許多蘇聯人對於美國的生活，文化與政治都有一套深邃的知識。我發現有許多美國作家，在蘇聯正如在美國一樣的出名，他們的作品同樣常被讀到。

有一天，我朋友的女兒，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來拜訪我們。她問到我美國的生活和文學。她討論到一些作家如馬克吐溫、古柏、德萊塞、阿普登、辛克萊、路易士、史坦培克，她討論的那種熟練的態度，的確使我驚異。我敢斷定她是帶着失望歸去的。她曾預期學習到一些她所不熟習的美國作家，但是結果她自己反為我解說許多我所不熟習的作家。

我看到蘇聯普通公民對美國的了解有着不可比擬的更多的準確情報來源，他們對美國生活的誤解遠較一般美國人對蘇聯生活的誤解為少。我看到在蘇聯並沒有企圖強迫蘇聯讀者激起仇恨。美國人民的報紙宣傳，而在美國——我們都知道——報紙與無線電的全部力量都是為了反對蘇聯公民的。

在華盛頓，人家告訴我所有的蘇聯公民都「恨他們的政府，怕他們的政府」。結果這却是一種謊話。我和幾十位蘇聯公民談話中，發現他們對於自己的政府、共產黨、與他們的領袖們都有極度的信賴與尊崇。

我要特別指出的是蘇聯公民是世界上最熱誠的愛國者。在許多情況之下，他們在前方、在後方都會經過國忘生，並且他們準備在任何時候再保衛蘇聯，抵抗任何敵人！——不管他們是由那裏來的。

我發現蘇聯公民對於他們的領袖，約瑟夫·斯大林大元帥有着極大的愛戴與尊敬，這種崇敬是建築在每個蘇聯公民都知道的事實上的：即斯大林會將他全部生命貢獻給蘇聯人民，而且由於他的真摯的現與決斷得以在歷史上最危急的時刻將蘇聯由災難中拯救出來。

一年以前的某個晴天，在莫斯科我拜訪過一位女朋友。她家所住的一間大而寬闊的屋子裏面陳設得很簡單。牆上是一張斯大林大元帥的畫像，那是這屋裏面唯一的畫張。我問她父親使她把那張畫掛在那裏的究竟是什麼樣感情。

她露着興奮與驕傲的神色回答說：「斯大林同志和我——我們在一九四二年十月的那些考驗日子中曾經一同留在莫斯科。那時許多神經衰弱的人們都害怕。其中有些就說莫斯科將會陷入德軍之手。我們都知道那對我們是什麼意思；我們聽見別人說過——那些抽離軍站領事館回來的人就在德軍統治之下，別動隊所遭受的什麼樣的屠殺與搶劫。我老實說我也有些猶豫。可是我就沒有離開我的鐵床一步，因為我知道我做出來的軍火都上什麼地方去了。」

他繼續說：我們知道斯大林同志是和我們在一起的。他領導莫斯科的保衛戰。當我聽見這個消息時，我在茫茫廠裏，我還記得在我那廠裏的我和旁的工人們是怎麼反應的，我們知道斯大林同志領導着我們和奧迪的數百萬工人與戰士在保衛我們的首都。我們爲了生產炮彈，每天工作十二、十四、十六小時。我們工作着，直到倒在現場裏，睡上幾小時，又開始做。我們知道斯大林同志領導我們經過偉大考驗走向勝利。他曾經在戰爭中領導我們走向勝利。他現在正在和平中領導我們走向勝利。他從德國人奴役下把我們救出來。我不是一個共產黨員，可是在這樣一位領袖經過生活我以爲是可驕傲的特權。這就是爲什麼斯大林同志的畫像常在我家裏佔着光榮的位置了。

在國務院有人告訴我所有的蘇聯公民都兢兢業業地生活在懼怕蘇維埃秘密警察的氣氛中。這也是一句籠罩於我本身的觀察和與許多蘇聯人的談話，使我發現他們認爲他們自己是自由的，同時他們也確實是自由的。他們認爲他們的政府公正，同時它也確實是公正的。

我發現只有佔無限微小百分數的、企圖犧牲別個公民的福利而自肥的蘇聯公民才會不安，因爲他們知道蘇聯的正義必然會捕獲犯者，予以懲罰。

我看到企圖出賣蘇聯利益的公民（雖然這樣的人數極少）也受到嚴厲的懲罰。同時我看到蘇聯國家極大多數的忠誠蘇聯公民睡得很安詳，他們在自己的權利與自由中感到有所保障。因爲蘇維埃國家警惕地保衛這些權利和自由以反對罪惡分子的叛變與利用。

在國務院，人家告訴我蘇聯的俄羅斯人剝削着其他一切的民族。我親眼見到的是蘇維埃聯

邦是世界上維護完全種族平等的唯一國家，在實際上，法律上都是如此。

一切蘇維埃公民，不論宗教、民族、或膚色，都享有同樣的權利、同樣的尊嚴，和同樣的義務。我發現所有民族的人民都有參加任何種有益活動的機會，不受到歧視或偏愛。

我看到蘇聯是一個這樣的國度——在那裏有數十種民族和平共處，並且享有發展他們民族文化的每一機會。

我記得爲了慶祝一位蘇聯朋友的生日在——所莫斯科飯店裏消磨的一個黃昏。坐在桌旁的是蒙古人、與卡查赫人阿愛沙尼亞人與烏克蘭人、猶太人、俄羅斯人與阿美尼亞人，在一間屋裏吃飯。據他們自己的方式娛樂自己。每個人都感到他自己是整體的一部分，並且這飯店的門並不因爲來人的皮膚是黑色或褐色，或因爲種族的偏見拒而不納。一位阿美尼亞人和一位俄羅斯朋友並肩而坐，起始爭論莫斯科與愛爾溫氣候的優劣。他說話的嗓音宏亮，可以使四座皆聞。這論點進而爭執到俄羅斯和阿美尼亞的一般優劣問題，而且當這位愛國的高加索人的熱情被覺察到的時候，令我相信他們會互相毆打起來。爭論變得如此熱烈，以致引起全廳的注意，甚至驚動了飯店的經理部。隨後我轉過身來，看見這兩位對頭人在握手。俄羅斯人另外一隻手裏拿着一杯阿美尼亞的白蘭地酒。阿美尼亞人拿着莫斯科的沃得加酒，建議阿美尼亞人爲莫斯科乾杯，俄羅斯人爲愛爾溫乾杯。

我聽過著名歌唱家與女演員塔瑪拉·哈納姆穿着華美的服裝，唱十六個民族的民謠。她表演每一支歌的時候便穿着那一個民族的富於色彩的服裝。對於我來說，塔瑪拉·哈納姆便是中亞細

要人民的在蘇維埃生活所已費經達到的地位的家徽。她的歌聲在佔大多數的俄羅斯觀衆中開所喚起的歡呼聲無就是蘇聯人民將至蘇各民於文化當成他們自己的文化之生動的證明。也是他們欽佩與崇拜其他民族文化的證明。

我個人從電影界、藝術界、體育界、政治生活與政權活動中看到的事實是全蘇聯的非俄羅斯人在應用其創造能力和擔任實際工作上均與俄羅斯人有同等機會。

在大使館，有人告訴我說蘇聯婦女被強迫驅入工廠，她們是受剝削的。

我本人看到特別是我離開大使館，開始參加蘇聯生活時，祇有在這個國慶裏，婦女才能在事實上以及法理上與男人一樣享有同等權利。祇有在蘇聯，她們才能享有同工同酬的待遇。而且祇有在這裏，婦女才能在實踐中得到提到最負責工作崗位的充分機會。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婦女，在醫務、科學、藝術、文學，甚至於在工程學的領域內，從來沒有像蘇聯這樣佔着如此大的比例數字。

我曾在這裏遇到數十位婦女，她們在不同的行業中都佔據負責的地位。在我們的朋友中，有一位女科學家，斯大林獎金獲獎者，她得過列寧勳章與勞動紅旗勳章，她的研究工作使她在蘇聯都享有盛名，但是她尚有餘暇照顧兩個小孩子的家庭。她也許是個例外，因為她有才幹。但是對於我說，她象徵了千百萬在蘇聯科學界，技術界與藝術界從事重要工作的婦女們。

我看到蘇維埃政府已經建立了一種制度，照顧有工作的母親的兒童，使一個女人又做母親又從事於一種職業。

我本人就親身領畧蘇聯政府對於母親們的照顧，當我要生小孩時，我免費受過幾個月的產前照顧。最後幾週，當我不能去醫務所時，有一名看護派到我家來，正如派到我所認識的其他未來母親的家中一樣。當我需要去產婦醫院的時候。有一輛汽車派到我住的公寓來。這車特別隸屬於產婦醫院，爲未來母親們的需要而準備的。

在產婦醫院，我享受到完整的醫藥治療，醫院的便利條件與飲食——都是免費的。小孩生下來了，並和我一起得到十天的照顧，用不着花一文錢。這並不是專門爲我預備的一些條件，而是蘇聯每一位母親均能享有的權利。世界上有那一個旁的國家能夠找到這麼好的照顧呢？

我在美國的朋友們有了小孩得付產前看護費、汽車接送費、醫院中的床位費、飲食費，差不多連她們在那裏呼吸的空氣也要付費。當她們回到家中，最需要無憂無慮的時候，她們却接到了五百美元左右的贈單。

幾個月以前，我參觀了在莫斯科的一所孤兒院。院長是一位年約四十的婦人，自己有一個家庭，她很喜歡小孩子，她領着我看了她的一羣孩子，把我介紹給她所負責的幾個小男孩。我很少見過這樣一羣健康和愉快的兒童，肥胖、結實、忙忙碌碌、玩着、蓋着房子，還有，是的，有的時候也打架。他們和有父母的孩子一樣在一切有利的條件中長大成人，也許比許多住在家裏的孩子還得到更多的照顧。他們對我來說，象徵着蘇維埃國家對兒童的照顧。

從我和許多蘇聯婦女的談話中，我發覺她們不需要過那種瑣碎的窮極無聊的生活像美國關太太那樣，也不需要過那種勞碌的生活，像美國和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工人和農民的妻子所身受

的一樣。蘇聯的婦女知道不管她們在什麼地方工作，在工廠裏、在田野上、在辦公室或在學校裏，她們絕不受剝削，知道她們自己會享受到勞動的果實，也知道她們正在爲一個偉大國家和一個新社會的建立做着偉大的貢獻。

在國務院和大使館裏人家告訴我蘇聯只有「特權階級」的兒童才能得到高級教育。

我發現任何一個蘇聯青年只要入學考試及格都可以受到高級教育，而實際上學生中絕大部分都是由國家資給教育，他們可以集中精力於學習，無須乎擔心經濟的需要會迫使他們半途而廢。我發現只有在蘇聯，工人才能在下班以後，在他們自己工廠的學校中學習，由國家出資培養他們成爲工程師和技術專家。

在我產後休息的時候，有一個女人來幫我做家務事。他是一個農家出身的，簡單、愉快、誠實的人。她的丈夫在莫斯科一家工廠做工。他們是一個普通的俄羅斯家庭，像整個蘇聯千百萬個其他家庭一樣。她有三個孩子，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她的兒子在戰爭中得了幾個獎章回來以後，現在在莫斯科大學讀物理系，他下了決心要做一個研究工作。在他面前有一段很長的艱苦工作，但是他得了國家獎學金，自給自足，對於他的家庭不是一個負擔。他會和數千名其他蘇聯學生一樣用獎學金自己供養自己念完全部課程。她告訴我，她的一個女兒已經在音樂學校畢業，現在正要進莫斯科音樂學院，在那裏她要做一個鋼琴演奏家，第二個女兒還在中學裏，但計劃進外國語言學院而且已經精通英文了。她有一天來看我，練習說英文。

我親自觀察到蘇聯公民有受教育的鼓勵，這種鼓勵是從下面這一事實來的，即他們知道，當

他們充分準備好去進行適宜的工作時，總會有位置等待着他們。他們知道他們是需要的，知道國家保證他們從事本行的工作。他們永遠不需要担心失業，如同美國以及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裏有些人所感到的無用的可怕感覺，這些人失掉了工作，被迫靠着政府菲薄的津貼和私人賑濟過活，要不然就挨餓。

我可以親眼看到只有在蘇聯，老年的工人才能繼續充滿了信心地工作，深知他們絕不會被開除，讓位於年青和身強力壯的人，祇有在這裏，每個人都知道只要他一天願意和能够工作，他就永遠有工作可做。

我親自看到在蘇聯每個公民都能够免費得到醫院的照顧和治療。很明顯，蘇聯工人安心生活，深知疾病和意外事件都不能剝奪他們的家庭和儲蓄，把他們拋在街上、貧困和債務叢生。蘇聯從來沒有一個工人被迫依靠於賑濟得到醫藥的幫助。

在大使館和華盛頓的國務院裏人家告訴我蘇聯的生活水準是世界上最低的一種。人家又告訴我蘇聯所遭受的戰爭破壞是如此的廣泛，除非得到美國的信用貸款，否則便需要好幾十年的功夫去恢復它，去重建被摧毀的城市和鄉村，使這個廣大的國家重新站立起來。人家告訴我蘇聯政府正把它的主要精力放在軍火生產上，它計劃用這些軍火發動一次新的世界戰爭。

當我到蘇聯之後，我看到的是任何一個美國人，要是他願意看的話，都可以看到的事物。我發現不論戰爭的最嚴重影響如何，早在一九四六年俄國人已經得到了更多的食物並比其他歐洲人民過得都好。我發現俄人到處都沒有挨餓，他們都有溫暖的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工作做。

我百以親眼看到蘇聯人在戰爭之前貢獻了多麼鉅大的力量來建築莫斯科，將革命前明明是一座大而雜亂、有着木頭房子和石子鋪路的村莊改變爲一個具有優美的林蔭路和廣場、大而美麗的公寓建築、世界上最現代化的地下鐵道、偉大的附設最新的實驗室和設備的教育機關之廣大現代化都市。

我發現早在二九四六年，在恢復戰爭的廢墟上已經有很大的進展。我可以看到迅速增加着的商品生產，雖然蘇聯是在絲毫不籍外援的條件下恢復着它的經濟的。在一九四六年秋我看到蘇聯人民以剛強的意志和對於未來的信念迎接由於那一年空前的旱災而造成的困難，我看到這些希望如何得到了證實，如何自此以後工業和農業便以世界上任何地方聞所未聞的速度進展着。

我看到如何蘇聯在一九四七年廢除了配給制度，一舉變成了歐洲最大的一個沒有配給制度、沒有黑市而有無數供給衆人吃用的糧食的國家。

我看到蘇聯如何經常減低物價，而在世界上其他國家裏物價却不斷扶搖直上。

不久以前我參觀了莫斯科附近伊斯特拉地區一座被德國軍隊焚爲平地的村莊。當他們撤退的時候，一所房子也沒有留下。現在很難找到一點毀壞的痕跡。在蘇維埃政府的幫助之下，每一所原有房子的地方都建立了一所新房子，大部分都比原來的好。當我經過一座座烏克蘭城市時，我看到那些被毀壞的建築物重建是多麼迅速。有許多情形都是城市居民在閑暇的時候自動從事重建計劃的。

在莫斯科每天我都可以看到新鮮的東西。從窗戶裏我可以看到新的街道在鋪設中。全城各地

都在植樹和開闢花園。新的一段地下鐵道——其中大部分或許在今年可以通車——正在離我家不遠的地方建築中。

我的朋友們告訴我他們的公寓裏已有煤氣設備。他們已經擲掉了過去不得不用打氣爐和電爐。街的那邊正在建立一所新的公寓；數十所這種建築物正在全城各地矗立起來。好幾百家人家不久就要搬到舒適的現代化公寓裏去。新的現代化公共汽車在我們的街上來往，新的蘇聯汽車也愈見愈多了。

我看到了戰時工業轉變成和平時期商品製造的具體效果——蘇聯汽車，拖拉機，新的火車頭，都是過去製造坦克，大砲和軍火的工廠中生產的。我看到了新的消費品多麼迅速的出現在市場上。我看到蘇聯政府對發展平時生產付以多麼大的注意。

幾個月以前，當我路過別洛露西亞火車站時，我看到士兵從德國回來，都是從那邊蘇軍退伍回來的年輕人。他們回到工廠和農場上去工作，其中有很多要回到學校裏去。每個人都滿臉笑容。

另一方面，當我在大使館的時候，我知道美國正企圖用其在蘇聯周圍所建立的基地，繼續不斷以戰爭威脅蘇聯政府，繼續增加龐大的美國海空軍來迫使蘇聯將生產中較大的一部從事於軍事目的，從而降低平時工業的進展。甚至於對我這樣一個沒有經驗的觀察者都很明顯，就是這種詭計是不會成功的。蘇聯政府能够保持足够的武裝力量，使威脅失效，而同時又實行戰後復原和進一步發展平時工業和農業的五年計劃。

西歐各國——它們只遭受到蘇聯領土上所發生的可怕的戰爭毀壞的極小一部分——却像窮親戚似的哭哭啼啼到美國去乞「援」。他們接受了援助的條件，使他們的人民永遠臣服於美國的經濟擴張。蘇聯在另一方面採取了它自己值得驕傲的和獨立的道路，不僅順利地解決了它自己的問題，而且有資源去幫助它的同盟者——那些也不願意去依賴美國國務院的國家。

當英國和法國伸出手來像可憐的乞丐似的向美國國會討乞時，俄國正在昂首前進。我個人寧願挨餓不願意排着隊去等待別人的佈施，我却喜歡而且羨慕蘇聯人民的勇敢、獨立和富於機智。他們不僅拒絕接受對自由人類所不能接受的條款下的國外「援助」，而且比那些接受美國佈施的國家更吃得好看得好。

在大使館和國務院裏，人家告訴我俄國人是「沒有文化的」和「野蠻」的，而且他們「不了解西方文明」。我發現相反一面倒是真實的，不僅我所碰到的俄羅斯人的知識發展比一般的美國人高得多，而且正是在蘇聯，西方文化的真正價值才得到了保存和發展，俄羅斯人不僅透澈地瞭解西方的藝術、文學、科學和文化，而且數世紀來一直對西方文明作有重要的貢獻。這些貢獻正不斷繼續着而且日有增加。蘇維埃公民正以他們淵博的知識和了解，從蘇維埃聯邦各民族無比的文明出發，對西方文明有更豐富的貢獻。

正是在蘇聯，知識分子在藝術、文學、音樂、建築、哲學和文化的其他部門中拒絕盲目地接受在西歐各國和美國所流行的、墮落的標準。只有在蘇聯，人類在這些部門方面的努力才不會走上死路。在蘇聯保護古典珍品使其免受一切攻擊所費的心機，最好從最近共產黨關於蘇維埃音樂

的聲明中看出來。對於作曲家的期待就是要他們恢復偉大的俄羅斯和西方作曲家的傳統，寫真正的音樂，而不要去步形式主義的後塵，因為後一道路可能使他們成爲無意義的音樂作家，像與德密斯的濁音一樣。

如果在世界音樂上出現一個新悲多芬或柴霍夫斯基，那麼很明顯他一定來自蘇維埃作家的行列，而絕非來自美國、英國或法國的音樂頹廢派。

只有在蘇聯，文化和宣傳的普及方法，報紙和無線電不是用來將文化垃圾的美學標準植到讀者與聽衆的腦袋裏去。

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的廣播節目達到了像蘇聯這樣高度的水準。我生病躺在床上的時候每天聽蘇聯廣播幾達十二小時之久。一點鐘跟着一點鐘都是優美的音樂會、許多有趣的演講、爲集體農民的節目、爲蘇聯兒童所特別請求的節目、莫斯科各個劇院的戲劇演出、我的丈夫的戲院的小型歌劇。這一切都在我的屋子裏。每天差不多都有三個不同的節目——沒有廉價的音樂，沒有任何想要兜銷肥皂、生髮油或福特汽車的，沒有描寫紊亂家庭生活的多愁善感的戲劇。連續聽上兩小時以後也無須吃頭痛片，在像美國所必須做的那樣。

我在這裏所描寫的印象不過是我在較短時期中居住此地所注意的許多事物中的一星半點而已。

我不想冒充俄羅斯的「專家」，像美國所慣用的名詞。我不想冒充任何東西，而只是一個美國女子，她來到這裏親身耳聞目睹，並且去熟識蘇聯人民。我所說的種種都是任何一個開通的美

國人或其他外國人在此地所能見到和了解的，而且可以寫——如果他或她有勇氣說出真理的話。我在蘇聯較短的居留期間所得到最深刻印象並非單單和生活中某一部門有關，而是對於蘇聯整個生活的一般感覺。

我覺得我現在生活於其中的一種社會，其進展之超過資本主義較資本主義之超過封建主義要大得多。

我親眼看到蘇聯是一種新型的社會，正在其發展的黎明階段，而人類進展的地平線在社會主義之下顯然是沒有止境的。

美國在目前所生產的汽車比蘇聯多，這是事實。

但蘇聯在文化和經濟上正在日新月異，其速度較美國在資本主義生長的繁榮時代的發展爲快，這却是一個更加重大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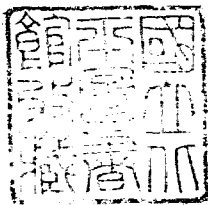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事實是：蘇聯是年輕、健康和精力飽滿的、充滿了繼續生長的能力，它是發展的，而美國却是紊亂、墮落、政治腐敗，已經墮入那些決心要使國家毀滅、一步步重複着德國的錯誤的領袖之手，除非他們及時停止，否則這一切會使美國走向自殺。

最後，一個重要的事實是，蘇維埃聯邦的每一公民，不管他生活中處在什麼地位，他有權展望未來，確信每一年都會比前一年過得好，確信他正在幫助爲人類和自己的後代建立一個新世紀，也許他自己也能見到。

做爲一個母親，我展望我兒子將來會生活在一種什麼樣的世界裏做爲一個，母親，我知道未

來是屬於蘇聯的，而我的兒子會比他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過一個更豐富、更好、更充實的生活。我知道在這裏他會長大成，得到最好的教育而無須乎像我那樣奮力爭取；我知道他不需要在不景氣的時候躑躅街頭尋覓工作，因為蘇聯根本沒有不景氣的時代，不管它的敵人如何想盡辦法要去製造它們；我知道他不可能變為軍火大王和石油壟斷資本家的炮灰；我知道他像一切蘇聯公民一樣，將做一個自由的人，一個人類過去從未從事過的最偉大進步運動的參與者。

我很高興我在這裏，我感到愉快的是我的兒子生在蘇聯，因為他所接受的遺產將是一個豐富的遺產。我感激蘇聯為我自己，但更為他所給予我的如此寬大的款待。



SEP. 12 1949

61 2 17



群衆書店

.5248
4)